

5061
5600.1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7 1956

中國語文

总第50期

8

1956



中國語文 1956年8月号(总第50期)目录

关于修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个问题..... 章 愨 (3)

怎样在语言科学研究中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笔谈).....

方光燾 王宗炎 刘澤先 刘靜文 宋振华 严学窘
吕叔湘 杜松寿 李振麟 陈仲选 姜 远 胡明揚
徐蕭斧 許紹早 景幼南 張寿康 黃智显 彭楚南
甯 渠 楊伯峻 楊柳桥 黎錦熙(以姓氏笔画为序) (7)

汉字的笔画结构及其写法与计算笔画的规则..... 丁 西 林 (21)

字母表的字母顺序问题..... 彭 楚 南 (24)

文学语言对全民语言体系的关系..... Р.И.阿瓦涅索夫 (27)

論京剧语音改革问题..... 翠 庵 (31)

太原人学习普通话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王 立 达 (35)

再说“与”类连词在多叠并列中的位置..... 蕭 斧 (37)

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初稿)(中).....

郑 夙 孙德宣 傅 婧 邵荣芬 麦梅翹 (39)

書刊評介..... 王宗炎、刘冠群等 (45)

語文短評..... 叔 湘 迂 公 亦 鳴 徐采芹 茜 莠 (49)

本社在青島召开語法座談会(动态)..... (6)

从“油票”的兒化說起(語文筆記)..... 倪 寄 予 (20)

对句型名称的意见(信箱)..... 黃 誠 一 (26)

“以上”和“以下”的用法(信箱)..... 陈 寿 頤 (51)

关于修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个问题

章 慤

一 各方面人士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主要意见

自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在报上发表广泛地征求意见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陆续收到了各方面送来的意见。从这些意见看来,绝大多数人同意草案的基本精神,但是对字母的安排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主要地集中在下列四个问题:

1. ㄑ ㄑ ㄒ 的问题;
2. ㄗ ㄘ ㄙ 的问题;
3. ㄐ ㄑ ㄒ 的问题;
4. ㄗ ㄘ ㄙ ㄖ ㄗ ㄘ ㄙ 的韵母问题。

关于ㄑ ㄑ ㄒ的问题,反对意见集中在ㄑ这个字母;其次是不同意用ㄑ ㄒ,特别是ㄑ。具体意见有主张变读的,如《ㄅ ㄆ 变读, ㄇ ㄏ ㄒ 变读,或者 ㄆ ㄑ ㄒ 变读。另有主张ㄑ改j,ㄑ ㄒ不动的。还有主张用其它字母的。

关于ㄗ ㄘ ㄙ的问题,一部分人要求另换三个字母,但没有提出具体意见。另一部分人主张在ㄗ ㄘ ㄙ这三个字母上另加符号,如 \acute{z} \acute{c} \acute{s} , \hat{z} \hat{c} \hat{s} 等等。还有一部分人建议用 zh ch sh, 或者其它双字母。

关于ㄐ ㄑ ㄒ的意见,有主张要的,也有主张不要的。主张不要的,认为可用隔音符号', 或者用字母来隔音。

关于舌尖元音,即ㄗ ㄘ ㄙ ㄖ ㄗ ㄘ ㄙ的韵母意见,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写出这个元音,但是不同意用小型大写 I 和手写时用 x, 并提出改用其它字母。另一部分人认为可以省掉这个元音。

上面所讲只是各方面人士对草案的主要意见。此外,还有很多人没有表示意见,究竟他们的意见怎样,我们还不知道。同时应该指出,已经表示完全同意草案的人还是有的。因此,我们现在还不能够作出结论,在全国范围内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主张这样或者那样。总的情况是:人们对于ㄑ ㄑ ㄒ ㄗ ㄘ ㄙ ㄐ ㄑ ㄒ等字母和舌尖元音的意见最多,也就是修改草案的问题的癥结所在。

二 怎样处理ㄑ ㄑ ㄒ和ㄗ ㄘ ㄙ这六个字母?

处理ㄑ ㄑ ㄒ和ㄗ ㄘ ㄙ等六个字母,是有各种可能性的。如果照草案的基本精神,即各有独立字母和一个音素一个字母的精神加以修改的话,那就26个拉丁字母是不够用的。为着解决困难,最简便的办法是除尽量利用原有拉丁字母外,在拉丁字母上另加符号。因为照草案的规定,声调符号要加在主要的元音上面,那就不便在字母上面再加符号了。因此,符号以加在ㄗ ㄘ ㄙ的下面为好,而最简单的符号就是一小撇,如 $\underset{\cdot}{z}$ $\underset{\cdot}{c}$ $\underset{\cdot}{s}$ 。这样的符号比草案的符号简单得多了,而且在书写时可在原有字形之下加一小撇,不必另造书写体了。至于ㄑ ㄑ ㄒ这三个字,可

以考虑改 η 为 j , q x 不动。这样一来,只把草案略加修改,就有很大的改进。通过普通話广播講座和拼音字母訓練班,已經有許多人学会了草案。只把草案略加修改,会受到这些人們的欢迎的。

但是这样的修改也有人不同意的。主要的理由是 q x ,特别是 q 的用法,跟原有使用習慣不符。这里牽涉到使用字母的習慣問題。所謂習慣包括国际上使用拉丁字母的習慣和我們使用拉丁字母的習慣。這兩方面的習慣有一致的地方,也有矛盾的地方。遇有矛盾的时候,我們必須有所取舍。我們應該根据漢語的特点和拼写漢語的需要,把字母作合理的安排。我們既不要标新立异,違反一切習慣,也不要拘泥于習慣,把自己束縛起来。

現在讓我們考虑一下 q x 的使用問題。 q 一般是当作 k 使用的。草案把它当作 $<$ 用,是跟漢語从 η 变讀为 $<$ 的規律相符的,因而是可以的。 x 本来有 h s z 三种讀法。草案把它当作 T ,跟 s z 接近,我認为也是可以的。

另有人指出,在 z c s 的下面加符号,写完了一个詞还要回头加符号,是不方便的。这样說法是有理由的。同时應該指出,在原有拉丁字母上加符号,是增加字母以滿足拼音需要的最簡便的办法。好几个兄弟国家的文字,如捷克、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等国的文字,都是这样做的。这样做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拼写出来的音节短,既与我国文字簡短的習慣相符,又可以节省紙張。因此,权衡利弊得失,我認为这是可以考虑的修改草案的办法之一。

还有一种可能的修改办法就是用双字母来替代 z q s 的办法。照这种办法,有好几种可能性。第一种是 η 改 j , q x 不动; z q s 改 zh ch sh 。这是上海一部分同志提出的修改办法。第二种是 η 改 j , q 改 c , x 不动; z q s 改 dz tz z 。这是丁西林同志提出的修改办法。它的特点是双字母的安排有語音学的根据。第三种是 η 改 j , q 改 c , x 改 hs ; z q s 改 zh ch sh 。它的特点是根据使用拉丁字母的習慣拟訂的:如 j 作 η , hs 作 T ,是在国内久已通行的拼法。除了这三种可能性外,还可以考虑其它修改办法。

現在讓我們比較一下單字母和双字母的利弊。單字母的好处是拼写出来的音节比較短,最多不过四个字母。这样做能够在書写上和排印上节省紙張,教学上也比較方便。它的缺点是字母的总数比較多;如果字母上另加符号的話,写完一个詞以后,还要回头在有关字母上再加符号,那就有些不方便了。

双字母的好处是字母的总数可以减少,書写时不要回头再加符号;如果字母总数以原有拉丁字母为限,可以利用現有打字机和排印設備,并且打电报很方便。它的缺点是拼写出来的音节比較長,書写和印刷多費紙張,而且有些双字母很难用語音学的原理來說明,給教学帶來一定的困难。

如上所說,單字母和双字母各有短長。單字母的主要缺点是:如果字母总数过多的話,將給使用文字的机械化帶來一定的困难,特别是打电报方面。据对打电报有研究的同志說,如果字母总数过多,打电报的速度会慢些,而且容易發生錯誤。据說为了打电报的方便,字母总数以不超过 28 个为好。双字母的主要优点是文字的机械化方面。在这点上,單字母的缺点是双字母的优点。但是在語音学(應該指出,双字母的配合也可以合乎語音学的原理,如丁西林同志的方案)、教学、節約紙張等方面,單字母比双字母强。如果字母总数不过多,不妨碍使用文字的机械化,我認为以采用單字母为好。但是这不是說非單字母不可,或者双字母是絕對不行的,因为字母的使用要从各方面来考虑,并且要看在整个方案里字母的配合如何。

如果不用独立字母来表示 η $<$ T 和 η η 的話,那就可以考虑三种变讀法:第一种是《 η 变讀,就是《 η 在 l u 之前改讀 η $<$ T ;第二种是 η η 变讀,就是 η η 在 l u 之前改讀 η $<$ T ;第

三種是 P+ㄨ 變讀，就是 P+ㄨ 在 IU 之前，改讀 ㄩ<T。至於 ㄩㄚ 用什麼字母來表示，可以另外考慮。照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所規定的《ㄅ 變讀法，是用 zh ch sh 來表示 ㄩㄚ 的。照國語羅馬字方案所規定的 ㄩㄚ 變讀法，是用 j ch sh 來表示 ㄩㄚ 的。照肖三同志所提出的 P+ㄨ 變讀法，是用 zh ch sh 來表示 ㄩㄚ 的。

變讀法的共同優點是節省字母；它們的共同缺點是教學上比較麻煩些。這三種變讀法各有優缺點。《ㄅ 變讀的優點是符合漢語語音的歷史變化，適合某些方言語音跟北京語音的對應規律。缺點是跟少數民族盡量利用漢語字母來創造或者改革文字的要求發生矛盾，因為有些少數民族的語音有 gi ki hi 的音，《ㄅ 變讀使他們不能夠很好地利用這樣一套漢語字母。同時雖然《ㄅ 變讀合乎某些方言語音跟北京語音的對應規律，但是拼寫這些方言語音跟北京語音的對應規律的時候，就得另找字母，這當然增加了拼寫這些方言語音的困難。

ㄩㄚ 變讀的優點是合乎北京語音的內在規律的，因為在北京語音里 ㄩ<T 只跟齊齒呼和撮口呼的韻母合併，而 ㄩㄚ 只跟開口呼和合口呼的韻母合併。同時 ㄩㄚ 變讀不跟拼寫少數民族語言、漢語方言和外来語發生矛盾。缺點是如果用雙字母作 ㄩㄚ 的話，即雙字母的出現次數增加了，這是某些人反對 ㄩㄚ 變讀的唯一理由。但是如果用單字母作 ㄩㄚ 的話，反對的理由就不能成立了。

P+ㄨ 變讀的優點是能夠適應尖音的習慣。缺點是加強說尖音的習慣，對語音的統一有一定的妨礙。

從上面的分析看來，這三種變讀法當中，ㄩㄚ 變讀比較好些。

三 怎樣處理 J W、舌尖元音和其它字母？

關於 j w 的問題，大家都承認這兩個字母的主要作用是隔音。它們的優點是能夠跟其它字母配合，在文字上比較好看些。缺點是多用兩個字母，並且有些拼法比較累贅些，如 jin, jing 等等；同時在教學上比較費事。如果用隔音符號，不如用 j w，因為隔音符號出現多，在文字上是不好看的。如果用字母來隔音，又容易在拼音上發生混亂。比較好的辦法是在必要的時候，用聲調符號來隔音，並且把它放在音節的最後一個字母上面，如 pínān（平安）。這樣既可以省掉兩個字母，又不致有上述的缺點。

這裡我們可以附帶談一談標注聲調的問題。在研究出更好的標注聲調的辦法以前，還是用現有的符號來標調為好。從正音的角度來看，標注聲調是必要的。為了使大家能夠正確地學好普通話，標注聲調也是必要的。在文字上沒有必要把每個音節的聲調都標出來，因為有些詞，如帝國主義、共和國、人民等等，就是不標注聲調，也不會發生混亂的。但是有些詞，如書、樹、砍、看、保衛、包圍、醫務、義務等等，如果不標注聲調，就會發生混亂的。一般說來，凡是可能發生混亂的詞，須標注聲調以示區別。當然，同聲調而可能混淆的詞還須用特別寫法來加以區別。這是另一問題，這兒我們不必討論了。究竟哪些詞需要標注聲調，哪些詞不需要標注聲調，應該實事求是地加以仔細的研究和實驗，然後做出結論。既然我們需要用聲調符號來區別可能混淆的詞，為什麼不同時使用這些現成的符號來隔音呢？

關於舌尖元音的問題，大家都承認這個元音是存在的。問題是要不要寫出來。我認為以寫出來為好。為什麼呢？第一，北京語音的特點之一是音節分明；如果不把這個元音寫出來，就不能夠顯示出北京語音的特點。第二，如果不寫出這個元音，像“蚊子”和“文字”這兩個詞，在拼寫上就沒有區別，這顯然是很不妥當的。如果用輕聲符號來區別，便會增加輕聲符號的出現次數，這是不必要的。第三，如果不寫出這個元音，隔音的需要增加了，這應該是儘可能減

少才好。第四,如果不写出这个元音,在教学元音和辅音的关系的时候,又要有例外,这会增加学习上的困难。当然,不写出这个元音是简单些;但是简单化又带来上述的困难。因此,权衡轻重得失,还是以写出这个元音为好。

用什么字母来表示这个元音呢?为了使这个元音跟 $\text{u} < \text{t}$ 的元音有区别,我认为可以用 y 来表示。 y 占用了以后,我建议用 u 来表示 U ,在国际上已有先例,如法语。 w 的发音,事实上跟 x 相同,因而用它来表示 x 是很适当的。本来可以考虑用 v 来表示 x ;但是为了保留这个字母在科学上使用以及拼写外来语、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之用,还是以不占用这个字母为好。此外, η 这个字母既可以减少隔音的需要,又可以缩短音节。因此,我认为不必更换这个字母。

四 几个可以考虑的修改办法

综合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个修改办法:

1. 关于 $\text{q} \text{ q} \text{ x}$ 和 $\text{z} \text{ q} \text{ s}$ 的问题

- (1) g k h 变读作 $\text{u} < \text{t}$, zh ch sh 作 $\text{u} \text{ ɿ } \text{ɿ}$;
- (2) q 改 j , q x 不动,用 $\text{z} \text{ q} \text{ s}$ 作 $\text{u} \text{ ɿ } \text{ɿ}$;
- (3) q 改 j , q x 不动,用 zh ch sh 作 $\text{u} \text{ ɿ } \text{ɿ}$;
- (4) q q 改 j c , x 不动,用 dz tz z 作 $\text{u} \text{ ɿ } \text{ɿ}$, ds ts s 作 $\text{p} \text{ ɿ } \text{ɿ}$ (丁西林同志的方案);
- (5) $\text{u} \text{ ɿ } \text{ɿ}$ 变读,用 j ch sh 作 $\text{u} \text{ ɿ } \text{ɿ}$ (林汉达同志的方案);
- (6) $\text{u} \text{ ɿ } \text{ɿ}$ 变读,用 j c x 作 $\text{u} \text{ ɿ } \text{ɿ}$, z q (ts 作代用式) s 作 $\text{p} \text{ ɿ } \text{ɿ}$ 。

2. 无论采取以上任何的修改办法,其它字母都作如下的安排:

- (1) 取消 j w 的隔音法,而用声调符号来隔音;
- (2) 舌尖元音用 y 来表示;
- (3) 用 u 作 U ;
- (4) 用 w 作 x ;
- (5) 保留 η (ng 作代用式);
- (6) 其它字母不动。

究竟哪一种修改办法比较好,还需要大家作进一步的讨论研究才好决定。

本社在青岛召开语法座谈会

为了更好地了解语法研究的情况,并且交换对于语法问题的意见,本社从7月27日到8月1日在青岛召开了语法座谈会。座谈会由本社社长章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等主持。出席座谈会的有丁声树、王力、王还、齐声乔、朱德熙、邢公畹、吕叔湘、吕冀平、吴晓铃、岑麒祥、林汉达、陆志章、陆宗达、周祖谟、胡明扬、郎峻章、俞敏、殷焕先、徐萧斧、曹伯韩、张志公、张寿康、张斌、许绍早、傅子东、景幼南、彭楚南、魏建功、萧璋等40余人。

座谈会首先分成4个小组进行漫谈,接着举行了三天全会。在全会上发言的有24位代表,他们广泛地谈到了语法里的各项问题。代表们谈到词和词类是怎样的语言现象,还谈到构词法的問題。对于句法,很多代表提出了自己对句法分析的意见,也对某些类型的句子作了具体的分析。此外,代表们对于语法研究的材料、方法和工作程序也交换了意见,大家都认为广泛地占有材料并作具体分析是十分重要的。有的代表从语法的角度对汉语的特点作了详细的叙述。对于如何在语言研究中开展“百家争鸣”也交换了意见。(座谈会发言摘要将在下期本刊发表。)

这次座谈会对于进一步开展语法研究工作将起一定的推动作用。(本刊编辑部)

怎样在語言科学研究中貫徹

“百家爭鳴”的方針

方光燾

在科学研究方面，“百家爭鳴”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針。但是，如何在实际行动中貫徹这个方針，則是一个很具体、細致、复杂的問題。

我觉得有一种情况是足以阻碍独立思考、科学研究的。那就是：一般發表文章的人大都欢喜揣摩風气，迎合編輯同志的心理。所謂“不願文章中天下，但願文章中試官”。例如我認識一位年輕人，他經常投稿，也曾因抄襲別人的文章受过批評，做过檢討。最近他写了一篇《論童話》拿給我看，而且征求我对他这篇文章的意見。我当时就告訴他：“你已經找到投稿的‘窍门’了！”因为在他的文章內也是罗列綜合中外有关童話的先进理論，再引用一些已經發表过的例証，这是四平八穩的文章，一定会受一般編者的欢迎。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有些报刊的編輯也着实欢迎“無一字無来历”的四平八穩的文章。就我看来，这种思想根源恐怕是怕負責任；但是他的危害性很大：崇拜权威，看不到新事物等等，都是从这里發生的。所以我觉得要真正开展科学研究，貫徹百家爭鳴，我們每个科学工作者都应该多动腦筋，把自己的“真知灼見”拿出来。編輯同志也不能只求“四平八穩”，有新見解的文章，就要考虑給以發表。

解放以来，在教学工作上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对古典作家的評價感到很难。在南京的人就要打听北京对屈原、杜甫、陶淵明、白居易等等是肯定还是否定；知道了“行情”才敢講，否則就不敢講，怕犯錯誤。我們知道，今天培养出来的学生需要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我們作教师的人却顧慮重重，不敢發表自己独立的意見，怎么能达到这一目的呢？

总而言之，我們要百家爭鳴，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討論，就要正确地理解和开展批評与自我批評。只有这样才能虛心接受人家的意見，才能負責地对人家提意見，也才不至于受了批評便畏縮不前，一蹶不振。

王宗炎

过去几年来，中国語言学界展开了几次爭辯，取得了一些成績，同时也暴露了我們的缺点，这就是在學習苏联方面存在着教条主义。有的人对汉語的具体問題不作具体分析，而以苏联某些語言学家的理論或定义为唯一的、一成不变的准繩，把它硬套到汉語上去。事实上，由于語言的隔閡，我們对于苏联学者的学說，有时还不能正确地理解。再說，某些学說，在苏联也只是一家之言，还没有取得大家的公認。况且，苏联的語言学者并不是个个精通汉語的，他們的学說也許只是把欧洲若干种語言中的事实概括起来的結果，对于汉語的特殊性未必考虑得很周到。如果在討論汉語的时候，我們只从定义出發，而忽視事实根据，那就难免削足适履的毛病了。

近几年来我們对資產阶级唯心主义的学术思想展开了批判，这是好的；可是就語言学來說，这种工作做得既不够广，也不够深。对資產阶级語言学說知道得比較多的人，有些并不做批判工作。另一方面，有的人想做批判工作，可是掌握材料往往不够，甚至连批判对象的著作也找不到。这样，唯心主义对中国語言学界的影响就不容易肃清，同时，資產阶级語言学者有些材料本来还可以利用的，大家也不敢利用了。

对于苏联語言学界的情况，我們也是比較隔膜的。近五六年来大家都罵馬尔，都說馬尔把

馬克思主义庸俗化,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們不应该到此为止。究竟馬尔的学說是怎么样的,他曾經有过哪些贡献,他的理論哪些部分是錯誤的,哪些部分还值得保留,他对于苏联的語言研究和教学工作起过哪些影响,哪些值得我們借鑒或警惕,这都应该有个明白交代。單純复述斯大林批評馬尔的話,已經不能使大家满足了。

还有一点要提一提:現在报纸杂志都提倡“百家爭鳴”,事实上是在京滬的各家先鳴,近京滬的各家后鳴,而远离京滬的各家往往欲鳴而不得鳴。一个問題提出来,报纸杂志总是向京滬学者們征求意见,对于散处各地的人,就沒有同样重視,或者不征求他們的意見,或者虽征求而限期十分迫切,使人不能充分考虑問題,提出比較成熟的意見来。这种組織稿件的方法,已經不能适应目前形势的要求了,应当切实改进。

刘澤先 要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我認為,必須使不同的意見有公开发表的机会。这是“百家爭鳴”起碼的一个重要物質条件。

不同的意見如果得不到公开发表的机会,什么“独立的思考”、“辯論的自由”、“坚持或保留的自由”等等就差不多等于空談。

要使不同的意見有公开发表的机会,就得多举行辯論性的座談会,更要供給一定篇幅的报刊来刊登这些意見。后者尤其重要,如果报刊总处于“篇幅有限”的遺憾狀況下,不同的意見难于公开发表或解釋,“百家爭鳴”是不会开展起来的。

举一个例子可以說明这个物質条件的重要。

在科学名詞問題上,尤其是化学名詞問題上,許多年来存在着意見的分歧。名詞工作部門認為漢語是“單音綴語”,基本詞彙就是“單字”,所以許多新名詞非造新的單字不可。那些單字里表意的偏旁、方塊兒、觚角等是不能去掉的必要成分。他們認為采用一些音譯名詞或外來語就“害苦了中国人”,如果大量采用,漢語就要“癱瘓”,“無法學習和使用”。他們認為根据斯大林同志和苏联語言学家的理論可以証明外來語跟本國語言是不相容的东西,吸收外來語是違反語言內部發展規律的。直到最近,他們还正准备在这样的理解基础上大規模地發展有机化学名詞。

可是反对这样的看法和作法的人越来越多,主張名詞要适当地国际化,要吸收外來語。

以今天的語言科学水平来衡量,这些問題并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難題。只要双方的意見能够充分地交換、爭論,就很可能得出大部分原則性的結論来;可是我們並沒有作到这一点,沒有很好地展开針鋒相对的辯論。

沒有展开充分辯論的主要原因是过去对“百家爭鳴”沒有認識,不同的意見常常受到排擠。可是缺乏爭鳴的物質条件也是另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寶貴的意見都在“篇幅有限”的理由下埋沒了。

多开几个座談会,多提供一些报纸、刊物的篇幅来爭鳴,所付的代价是很有限的,可是却能解决很多难于估价的重要問題。就上面的例子來說,科学名詞問題如果早一些解决,向科学进军的速度就可以大为加快,我們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早一些建設成功,这不是很显然的嗎?

刘靜文 我們認為,“百家爭鳴”是手段,“集体共鳴”是目的,但是必須通过紛然杂陈的“百家爭鳴”,才能實現百音協調的“集体共鳴”。換句話說,“百家爭鳴”的重点在于挖掘和發現,而“集体共鳴”則在于整理和統一。这里,單就語言学中的語法研究一方面來講:第一,我們希望已鳴者,尤其是在語法方面已經建立了一套体系的專家們,千万不要坚持偏見,甚至坚持錯誤,不要以自己的体系的全部或部分被破坏或者被推翻而不安,要有断然舍弃不合理的論断的决心和勇气。第二,我們希望爭鳴者务要認真切实,鳴其所不得不鳴,而不

要随意乱鳴。只有我們的研究成果，或者是創造性的發明，或者是建設性的批判，才好把它鳴出來。這樣，才可以發揮“百家爭鳴”的精神，達到“集體共鳴”的目的。

在語法研究方面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這責任主要地還是要由語文雜誌的編輯同志們擔負起來，因此我們謹向他們提出如下幾點建議。第一，應該承認語文雜誌的編輯同志們並不是周知一切的，他們的主要責任只在鑒定來稿中有無創造性的或建設性的內容。他們尤其不應該持有偏見或成見，只從某一個體系的立場來審查來稿。第二，不妨先認定語文雜誌只是交流意見的場所，只是“百家爭鳴”的論壇，因此凡遇“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文章就應該給以發表的機會。第三，由於來稿的作者一般都不是專家（即使是專家有時也會犯錯誤），他們的稿子並不能全部盡善盡美。這時，編輯同志們或者幫助他們提高，幫助他們深入研究；或者干脆把來稿中的一得一長或某些獨特見解刊登出來，提供大家批評討論。總之，對於任何可貴的一點一滴的意見或疑問，都要使它有向大家提出來的機會。第四，為了鼓舞“百家爭鳴”，應該盡量兼收衆長，發掘問題。如發現有大家所討論的某一個焦點問題時不妨另出專刊。等到問題發掘得很多，大家討論得很充分，然後再做整理統一的工作，就能找出一些科學的規律。

宋振華

我認為要做到語言學界的“百家爭鳴”，應當做的事很多很多，但是首先應當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要糾正依靠少數，輕視群眾的思想，二要向保守思想做鬥爭，三要堅決反對教條主義。

在我們的語言學刊物中（如《中國語文》）不能說沒有只依靠少數人或崇拜權威的傾向。在刊物上，總是那幾個人發表文章，或者除掉權威人士外，別人的文章只能補空子。是不是語言學工作者的隊伍小到只有幾個人呢？當然不是。經驗告訴我們，如果繼續看不見群眾，就會把百家爭鳴變成“幾員大將支撐局面”了。

我們語言學的工作隊伍中，保守思想本來就很嚴重，可是幾年中很少被揭露，這樣就使保守主義在這裡安睡下來。在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工作中，雜誌的編輯工作中，甚至在最近發給一些人征詢意見的十二年規劃中，都表現出保守思想：對群眾的東西看不到，對新的東西看不見，對新生力量看不起。

另外，就是那股教條氣味了。這股氣味是千真萬確地從教條主義那裡發出來的，最明顯地表現在高等學校的語言學各科教材中。我們許多學校的講義，內容都是缺乏生氣的，硬搬蘇聯的東西，重複斯大林的話，而漢語的實際卻敬而遠之。雜誌上發表的文章雖然有不少好的、有分量的，但是總的看來，應當說有些“僵化”。在百家爭鳴中必須反對這種教條主義的、僵化的傾向。要做好這方面的工作，就應當拿出各種不同的意見來，更多地介紹國內外的不同意見，組織翻譯力量，組織更多的各種形式的學術討論。另外，各學校的講義，似乎也應當都拿出來見見人，並有計劃地出版一些，便於互相切磋，展開討論。

嚴學窘

動員一切積極因素，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根據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研究語言科學中的實際問題和理論問題，開展創造性的討論和原則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就是促使語言學界“百家爭鳴”、迅速發展語言科學和提高語言學研究水平的重要保證。

我們語言學界首先要積極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本門科學研究的指導思想，今天不是機械地重複舊的“小學”遺風，而是批判地重新探討前代語言學家所創造的一切成果，對於從語文工作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所提出的問題，尋找新的答案，要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辨清表面現象與實質，作出切合實際、富有指導意義的結論。我們堅決反對羅列現象而不進行研究的純客觀主義的態度，同時也反對片面論斷、誇大事實和縮小問題的主觀主義的思想作風。

其次，我們語言學界要採取集體協作共同鑽研的原則，把語文工作過程中所提出的每一個具體問題，都公開揭示出來，鼓舞語文工作者的積極性和組織集體的力氣來解決，絕不摻雜所謂傳衣鉢的門戶之見。戰鬥性的語言科學，不在“家”之不立，而在深刻地批判宗派情緒和壟斷思想，去掉清規戒律，培養新生力量，“百家”自可“爭鳴”了。誰都不相信僅有初中文化水平，對語言科學毫無所知的少數民族學生，在我們少數民族語言調查訓練班經過四個月學習和實踐，也會處理少數民族語言複雜的音位系統，這樣作足可保證語言科學的推廣和解決民族語文的實際問題了。

再次，我們語言學界要消滅手工業式的研究方法。打開語言研究所《語言研究通訊》第一期的語言學研究選題一看，就覺察到題目煩瑣，沒有把一切基本問題都經過全面的探討，提出切合實際需要的極其重要的關鍵問題來。我們要在直接研究和概括語文工作的過程方面，從實際出發，選擇主要而又最本質的事實，進行研究，明辨方向，如果支離破碎地抽取個別事實，玩弄事例，那只是手工業式的狹窄的所謂“家”，不可避免地會使語言科學的研究水平降低。

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和業務的實踐，使語言學理論同實際密切結合，提高研究質量，“百家”必然“爭鳴”。

呂叔湘 “百家爭鳴”不一定為爭而鳴，但是既鳴之后就必然會爭。爭亦有道，爭而不以其道，就會爭之不已，永遠沒有結果。

甲說：“地里種的是白薯。”乙說：“地里種的是山芋。”

丙說：“這根管子有三尺長。”丁說：“這根管子只有一尺長。”

戊說：“窗戶是黃的。”己說：“窗戶是白的。”

凡此之類不必爭。甲和乙應該找個人問問，白薯和山芋是一種東西還是兩種東西。丙和丁應該把口袋里的尺拿出來比一比，也許一個是市尺，一個是公尺。戊和己應該對換位置再看一看，這窗戶是不是里外一個色。

“下雨地下濕。現在地下濕，證明下過雨。”“這個人頭上掉下一根白頭髮，可見他的頭髮是白的。”“你說如果你知道，你就告訴我，可見你是知道的，所以你应该告訴我。”“夏天大熱，冬天一定大冷。今年夏天大熱，冬天一定大冷。”“你不是胖子，所以你是瘦子。”“你借了他的錢，他借了我的錢，這就等於你借了我的錢。”

參加論爭，最好不要應用諸如此類的邏輯，因為這種邏輯發現不了真理。噴水車走過地下也會濕，一根頭髮白不等於滿頭頭髮白，“如果我知道”不等於“我知道”，夏天大熱冬天一定大冷還有待於證明，除了胖子瘦子之外世界上還有不胖不瘦的人，你和我和他之間沒有必然的轉賬關係。

你說：“既然成‘家’而‘鳴’，哪兒還會犯這種粗淺無比的錯誤？”這個話難於保證。這些例子是“提煉”過的，所以一望而知。一談論抽象的道理，用上許多高深的字眼，專門的術語，再穿插些長長短短的引文，事情就不一樣。無論是你的文章或是我的文章，一不小心都難免夾帶這種“論證”。過度的熱心有時候會妨害清醒的頭腦。儘管人情上大可原諒，要論爭鳴之道還是不能允許，提出來借以自勉和共勉。

至於爭鳴之時要鳴之有物，不要拿引文代替論證，不要拿標籤吓唬人，這些大家已經說過多次，我除了表示擁護之外不再多說。

杜松壽 我們興奮地聽到黨中央“百家爭鳴”的號召，它意味着四面八方向科學進軍，大家要像“八仙過海”，各自顯示自己的能耐，中國學術上將因此而出現空前蓬勃發展的局面。

但是我們不能是單純地樂觀，像迎接一個優秀的演出，坐在那里興致勃勃地拍一拍手。首先是一切文化科學工作者都應該拿出像參加一個戰鬥似的精神，去刻苦鑽研問題，然後才能鳴之有物，如果鳴得平淡無奇，人云亦云，或者竟是亂叫一通，在這個爭鳴的場合也就無人去听的。這是說能“過海”的才算神通，過不了海的還得再苦思、苦學、苦練。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個艱巨的任務，需要我們獨立思考，深入地研究問題，在實踐中考驗我們的研究、主張和意見。

我們語言學界一向就有一些爭執的問題，有些還爭執得不得下台，這似乎也表現了“百家爭鳴”的精神。但是從實質上談，我們還遠遠不夠。不能說幾年來我們對若干問題的討論沒有一點兒成果，這樣的說法是不正確的；但是在我們的討論里也存在着不小的偏向。我覺得主要的偏向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過多地看人家的樣子，人家說什麼對我們就是“定義”，人家在他們的特殊情況下解決了的問題，就認為我們也不必再談起。這樣就脫離了漢語的實際，中國的實際，走向教條主義的泥潭；所以獨立思考，從實際出發是我們今後應該積極採取的態度。另一方面，我們還沾染着不少從舊社會帶來的文人相輕的宗派主義習氣。夠得上敵手資格的雙方，“爭鳴”得很像一回事，但是大家忘記了一條最高的原則：我們是要通過大家的智慧和鑽研求得一條真理，正確反映客觀規律並且是具有現實意義的真理。我們應該肯定大家認識一致的東西，吸收對方的寶貴的獨特的發現，虛心接受人家所指出的自己的缺點，以協作的精神求得不同意見部分的最後的共同認識。比方拿漢語規範化問題、語法體系問題、文字改革理論問題等來說，如果不採上述客觀的科學的態度，我們會永遠爭論不休的，群眾也將不歡迎這種“爭鳴”。

在正確對待“百家爭鳴”問題上，我們還應該有雄偉開闊的胸襟，決心清除自己的主觀主義。我們常常把自己所指的見解當做最高原則，而瞧不起別人從另一個角度來處理問題的意見，認為別人是淺薄無知的、幼稚的。這兒其實也表現了自己的幼稚。只有努力克服這種偏見，“百家”才“爭鳴”得起來，否則會在一些冠冕堂皇的口實下扼殺“百家爭鳴”的壯舉。當然，淺薄幼稚的意見不是沒有的，但是在这个分界上如果多走了哪怕是一小步，就會犯嚴重的錯誤。為了我國學術上的空前繁榮，大家都邁開腳步前進吧！

李振麟

貫徹“百家爭鳴”的政策是提高我國科學水平、擴大科學家隊伍，從而使我們可以在不太長的時期內趕上或接近世界水平的一個重要措施。這個工作在語言學界尤其重要，因為這一門是“家”既不多，“鳴”也不夠。多少年來搞這行的人數實在不多，也有不少搞這行的人沒有什麼機會“鳴”。應該考慮如何在語言學界很好地通過這一方針的貫徹來發揮潛力，擴大隊伍。

為了順利開展學術上不同意見的自由討論，我認為首先要實踐中貫徹“不以言廢人，不以人廢言”的精神。這樣才能使大家無所顧慮，暢所欲言。曾有一位科學家這樣說：“有些人對寫書有過錯誤的人連接近都不願意。”有時也聽人這樣說，“某某人受了批判。”言下之意，好像一個專家的著作受到某些批評，他的學術地位便一落千丈，甚至對於他的整個學術水平發生懷疑。另外也有人寫文章、著書、譯書不願寫自己的名字，以防因受批評而影響個人威信。這些現象都說明在學術界是有以言廢人的不健康的風氣。這種風氣對於“百家爭鳴”有妨礙，必須立刻糾正。任何專家不能保證他講的話全對，咱們不應該以個別問題上的錯誤，來否定人家全部的成就、一生的勞動。當然，對於接受批評的人來講，也不應該因為存在過某些不很正確的批評態度，因而產生保守思想，索性少寫少講，自己對於自己的學術水平也要有個實事求是的估計，不能因個別的粗暴批評而從此不鳴，或表示消極。

“以人廢言”也是百家爭鳴中的障礙，這種現象，當然也要反對。過去出版界有時對於受過批評的人的著作不大歡迎，刊物編輯對於無“名”人物的著作也重視不夠。另外，我們反對某些

資產階級語言學家的唯心主義觀點，可是他們的著作中也有個別正確的結論，特別是他們所累積的大量語言事實，咱們應該十分重視。比方，叶斯柏森的語法理論中有比較嚴重的唯心主義觀點，可是他在個別語言問題的研究上，还有不少可取之處。至於他的七卷《近代英語語法》中所搜集的資料之豐富，到今天為止，能跟他比的人並不多。因此批判與吸取應同時考慮，對於科學著作中的觀點、個別的規律的揭示與資料應該分別對待，很好地掌握分寸，不能因為反對叶斯柏森的“三品說”而否定他的一切，這樣對於提高我們的科學水平沒有好處。目前有一種不一定是普遍存在的偏向，非馬、恩、列、斯之語不敢引，非蘇聯之書不敢讀，這也是以人廢言的表現。我們得承認現在蘇聯語言科學在世界上是最先進的，應該是我們學習的主要對象，可是並不是所有蘇聯的著作全都對。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契科巴瓦是蘇聯有數的語言學家，可是在他的《語言學概論》一書中，對於漢語的看法就不對頭，對於英語的一些基本事實的運用也有不該有的錯誤。比方他說，storeyed 這個詞中間 -eye- 是三合元音（實際上只有一個 i 元音）。可是我們並不因此而完全否定這部書的價值。我的意見是，在語言學的領域中我們過去虛心學習蘇聯還不夠深入普遍，學習蘇聯語言學是提高咱們的科學水平的一個關鍵，可是在學習蘇聯中也不能產生門戶之見，對於某些資產階級語言學家的著作望而生畏。

最後，中國語言學界苦於“家”太少，在貫徹百家爭鳴中，要特別注意培養年青一代。關於這一點，科學院、高等院校有責任，各個語文刊物的編輯部也有責任。編輯的責任不只在审稿中找質量較好的稿子，更重要的是如何指導青年人把質量不夠高的論文在修改中得到提高，正好像科學院、高等院校的專家指導學生的學年論文、畢業論文那樣。

黃智顯 在學術研究上貫徹“百家爭鳴”，決不能誤解為“非家莫鳴”，而且“家”的標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通過“爭鳴”才可以培養、鍛煉出更多的“家”。我們年青的科學工作者，一般說來，業務能力和基礎知識都是不夠的。我們還不成其為“家”。我們固然不應該自高自大，但是也不應該自暴自棄，今天的學術界有不少真正權威的專家，他們都是我們的老師。那麼，我們這些科學工作中的小兵是不是可以同他們“爭鳴”呢？我們認為完全可以的。我們雖然水平不夠，但也會有“千慮之一得”。

在客觀方面我們也有點要求：首先，我們希望前輩不要對我們有過於苛刻的要求。在科學隊伍中我們是小兵，又是新兵，要在科學理論上要求我們一下子就有自己的體系是不切合實際的。當然，我們也有決心刻苦鑽研，要在深入鑽研的基礎上來“爭鳴”；所以前輩們對我們就不能要求得過高過急，求全責備。目前的情況是許多青年科學工作者怕說錯了話被一棍子打死，如果對我們過於求全責備，那實際上就等於壓制新生力量。

其次，我們要求學術刊物的編輯部能夠徹底克服崇拜權威的思想。崇拜權威就必然壓制新生力量。編輯同志在审稿的時候，既不要憑自己的好惡來取舍，也不要從作者是否有名來衡量。足以作決定的只有看文章的內容有無價值。

我們並不護短。我們所要求於前輩們和編輯同志的只是耐心培育我們，熱誠鼓勵我們，而不是用許多“清規戒律”來打擊我們。只有這樣，我們的科學隊伍和水平才能不斷地擴大和提高。

陳仲選 黨中央的“百家爭鳴”的政策提出以後，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 6 月 19 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出了“百家爭鳴”要“鳴得好，爭得好”的口號。有人認為這種提法容易誤會為“爭得不好的不能爭，鳴得不好的不能鳴”，等於限制。我認為這是希望，不是限制。既然是“百家爭鳴”，在爭鳴之中不一定家家鳴得都好。要求“鳴得好”才是“百家爭鳴”應該達到的最後目的。因此，在學術刊物中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我是非常擁護的。“鳴

得好，爭得好”这个希望，我相信也是能够如願以償的。

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智者千慮難免一失。專家的意見固然值得重視，反駁專家意見的意見也不可忽視。語言學界要想“鳴得好，爭得好”，首先得叫百家互相展開批評。健康的批評能够引起虛心的自我批評，不同的意見能够由于批評和自我批評而趨于一致，這才能使研究的水平不斷提高。因此我們要求編輯同志們善于分析、整理材料，要因“文”而有所取舍，不要因“人”而有所厚薄。

“百家爭鳴”就是要求學術上不同的意見都能得到自由發表、自由討論的機會，但是刊物的篇幅有限，如果少數權威者的大塊文章佔據了過多的篇幅，那就等於剝奪了多數一般人的發言權。所以刊物的篇幅問題也是值得考慮的，不過，考慮篇幅並不等於不要長篇，而是要求精簡。

姜 远 “百家爭鳴”的方針為我們青年科學工作者的成長創造了最良好的條件，真正有志於科學研究的人，將有更多更好的機會對人民科學事業獻出自己的力量。但無論條件多好，畢竟不能代替我們自己的成長；如果我們自己不爭氣，再好的條件也是白搭。所以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們應當更加頑強刻苦地學習和研究，唯有這樣才有可能“鳴”，並且“鳴”得好。

過去我們有過這樣的毛病：書讀得不多，也沒有經過刻苦的鑽研，翻閱過幾本馬克思列寧主義書籍，就自認為是唯物主義者；別人，尤其是老科學家，都是唯心主義者；因而盛氣凌人，隨便給人扣上幾個大帽子。寫的文章也是干巴巴的，像個“癩三”，翻來復去只是一些教條的術語的堆砌。這樣的態度是不踏實的，對於自己和科學都沒有好處。

我們年青同志對於蘇聯的先進科學理論是衷心擁護和十分熱愛的。但缺點是，在學習蘇聯的時候，每每不善於獨立思考，缺乏創造精神，因而陷於教條主義。很多蘇聯語言學家的論點是針對俄語而言的，可是有些人卻把它硬加在漢語頭上，這和馬建忠的方法犯着同樣的錯誤。更壞的現象是一知半解地搬用一些蘇聯學者的論點，卻以“先進”自居，輕視民族遺產，認為我國語言學家的研究成果一概是“落后”的、“唯心”的。少數從事俄語工作的同志寫起文章來也往往公式化，先敘述蘇聯學者的某一論點，再批判中國學者的相應的錯誤論點。批判當然是要批判，不過我認為，在批判之前，首先應虛心地學習一下，先提出其中可取的成分。如果我國語言學家的論點和蘇聯語言學家的論點有什麼不同，不見得一定就是我國語言學家的錯，也許都是對的，因為論述的對象不同。而且，蘇聯學者的有些論點，在我國語言學者的著作中也曾出現過，只是說法和術語不同而已，我們不一定要舍近而求遠。

因此，加強學習和研究，是我們青年科學工作者貫徹“百家爭鳴”方針的首要任務。

其次是關於培養新生力量問題。“百家爭鳴”應該使“家”愈來愈多，這樣才能“鳴”得更響、更熱烈，這就要求各方面要特別重視科學界新生力量的培養。前一個時期，對於青年文學創作問題是重視了，報紙副刊和文藝刊物都以培養青年作家為己任。各地在作協和青年團的組織下，重視有文學創作才能的青年的發現和培養，輸送了不少青年作家，壯大了文學創作的隊伍。可是在科學界，這項工作卻做得很差。在研究機關和高等學校，情形稍許好一些，但對於散布在其他崗位上有科學研究志願和能力的青年的培養工作，卻沒有引起人們應有的重視。實際上，真正有希望的青年科學工作者不一定全在研究單位和高等學校。有些青年堅持業餘研究，沒有指導，缺乏參考材料，有時還得不到支持，但艱苦的環境鍛煉了他們的意志。這些人如果費點力量去發現和培養，是有希望成為優秀的科學家的。因此，我建議《中國語文》等學術刊物和有關方面能做到下列三點：

1. 不存有“非家莫鳴”的思想。對於青年來稿能及時地耐心地答復，重視他們的一點一滴

的心得,关怀和指导他們的研究。对于这些青年來說,編輯部是他們唯一的、也是最受尊敬的导师,編輯部的話在他們心里是很有分量的。

2. 在青年作者中注意發現那些有才能的、肯坚持研究的人,更多地培养他們,經常地了解他們的工作和研究的情况。在可能条件下,把他們組織起来,帮助他們解决缺乏指导和参考資料的困难。

3. 在适当时机,当他們具备一定水平的时候,建議有关單位分配适合于他們能力的科学工作,扩大科学家的队伍。

这些措施如能真正做到,必將極大地鼓舞广大青年向科学进军的热情,从而保証“百家爭鳴”的方針貫徹得更好。

最后談一談关于語言工作者的組織問題。要“爭鳴”得好,必須加强組織領導,这是統一而不矛盾的。为了更好地組織語言工作者完成各項關鍵問題的研究,發揮互助作用,避免重复和浪費,我建議成立“語言学会”;并以各地高等学校的語文系或語言教研室为中心,組織当地具有一定基础的語言工作者成立“語言研究小組”,作为語言学会的后备队伍。語言学会和研究小組可以在全国範圍內協調成員的研究題目,定期举行各項重大問題的討論会、报告会,出版討論的專刊。無疑地,这些措施对于在語言学界貫徹“百家爭鳴”方針会有重大作用的。

胡明揚 要在語言学界貫徹“百家爭鳴”的政策,我認為應該考虑到我国語言学界的一些具体情况。語言学过去是所謂“冷門”的学科,因此目前从事語言科学研究工作的人为数不多,至于这方面的專家那就更少了。可是要“爭鳴”就必須先有“百家”,否则就“鳴”不起来。如果只是寥寥几家,那么即使“鳴”得很好,很嘹亮,也不容易达到“百家爭鳴”的目的。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培养幹部、培养年青的一代就不得不成为当前工作的重点之一。因此,專家們除了各抒己見为祖国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以外,就必須分出一部分時間和精力来培养和指导青年語文工作者,使他們早日成長。

解放以来,語文工作者的队伍是扩大了,但是大部分青年由于过去沒有系統地受过严格的語言科学的基本訓練,他們的水平是不高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不免有一些困难。如果要他們“鳴”,并且“鳴”得还基本上可取,就还要經過一个相当时期的刻苦鑽研,同时也脫离不开專家們的直接或間接的指导和帮助。我恳切地希望老一輩的語言學家們都能抱着“誨人不倦”的态度来帮助青年語文工作者迅速提高。为了促成“百家爭鳴”的局面,我还希望有关的部門創造一些必要的条件来使各“家”以及未成“家”的語文工作者有得以一“鳴”的机会。

“百家爭鳴”是希望在各方面能貢獻出科学研究成就,哪怕是不大的成就,可是不希望在一些術語上“爭鳴”。相反地,为了推进科学的发展,科学術語的概念必須明确一致。語言学的術語最好能够基本上統一起来。

要“百家爭鳴”就免不了有批評和反批評。爭論只要是为了爱护真理而不是为了个人意气,那是一点兒也不可怕的。真理是愈辯愈明的,也不必害怕会“攪混”。但是批評和反批評也應該措辞得当,避免空洞的辞句和不相称的帽子。每一个人應該抱着同志般的商榷态度,文章本身也應該具有丰富的学术內容。

为了“百家爭鳴”,我們還應該很好地學習。除了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义以外,对于古今中外优秀的語言学著作也應該进行學習,批判地吸取其中的精华部分。过去几年来在这方面是有些缺点的。不是無条件地“全盤接受”,就是無条件地“一笔抹杀”,或者是有意地“避而不談”。这样对于我国語言科学的发展是不会有好处。目前我們需要的應該是对这些著作的公正的評價。

最后,我希望“百家爭鳴”的政策在語言學界的貫徹能够使我們全体語文工作者更好地團結起来,为大家共同的目标而貢獻出自己的全部智慧。

徐蕭斧

党和政府倡导在学术研究上实现“百家爭鳴”的方針以后,一再有人举出若干历史事实,証明真理不一定站在多数人的一边,学术問題不能采取“表决”的方式来下結論。这样說法,用意是很好的。它可以鼓舞对某一学术問題抱着独特見解的人坚定信心,不要在“多数”面前輕易屈服,放弃爭論;也可以啓發反对这种見解的人重視对方的意見,不要輕率抹煞,同时更深入地檢查自己的見解。因为既然代表“多数”的見解不能使对方接受,即使对方的見解是不正确的,至少自己的見解还是不够坚实的。这样做法,可以使我們的認識不至于流于片面,使我們的科学研究更有生机,使我們更接近真理。

但是目前似乎有人从这句话上加以引申,說真理常常站在少数人的一边。这样的引申似乎不免曲解,因为我們同样可以举出不少历史事实,証明代表“多数”的見解也往往是正确的。这种引申是不大妥当的,它会引导代表“少数”的人輕視相反的見解,滋長他們“孤芳自賞”的态度,养成他們“目空一切”的性格。代表“多数”的見解即使不應該得到学术界的特別的重視,至少也應該得到反对者的足够的重視。

总之,我們不能人云亦云,存心“以众暴寡”、“仗势凌人”,也不能我行我素,存心“罢黜百家”、“唯我独尊”。虛心听取別人的意見,檢查自己的主張,对任何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要是認為別人的文字尽是一文不值,浪費紙笔,惟独自己的著作才是一字千金,擲地有声,这就不是拥护“百家爭鳴”的方針,而是采取“一家独鳴”的态度了!

許紹早

“百家爭鳴”的提出,对語言学研究工作的开展是有極其重大的意义的。應該把这一方針貫徹到語言学工作者的行动中去,使我們能“鳴”起来,并且能“爭鳴”起来,还要“爭鳴”得好。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須要語言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而报刊的編輯工作者也負有很大的責任。

作为一个語言學界的初学者,我希望我們的“百家”能充分地占有材料,从材料中歸納出客觀的規律来,而不是拿我們的主觀想法去規定材料。当然,在整理、歸納材料的过程中,由于对材料的理解有分歧,或者由于整理方法有問題,等等,有时不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結論来。但是,只要我們在实际的大量的材料前面,真是心平气和地探討,正确的結論总会得出来的;并且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爭鳴”健康地开展起来。我們不贊成那种只承認“一家之言”的做法,那可能使我們只用某“家”之言来規定实际材料,而不是用实际材料来檢查某“家”之言。有人以为,既有了这“家”之說,又何必再标新立异,另創一說;他們不大去注意人家另創一說的原因和根据。这是不好的。要克服这一点,当然有待于語言学工作者的努力,而报刊編輯工作者也負有很大的責任。作为一个編輯工作者,應該徹底地清除那种只看到几家权威之說的成見,不應該害怕学术上的标新立异,而應該看一看人家所占有的材料,所提出的問題,等等。这样,才能使报刊有“爭鳴”的余地,也容易使“百家”来参加;而教条主义也就沒有多少活动的余地了。

要貫徹“百家爭鳴”,展开批評与自我批評是很重要的。我总觉得我們的刊物过去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好,不是說一点沒做,而是說做得不够。有些批評仅仅是輕描淡写,而尖銳地提出問題的則很少。希望編輯工作者加以重視,有意識地引导对問題的討論,尊重对問題的批評意見,不應該害怕批評的文章,更不應該濫用修改权,不适当地修改人家的批評意見。当然,“爭鳴”者也应该从事实出發,不應該乱扣帽子。

景幼南

在一切学术里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原則上似乎没有什么兩样,然而在語言學界却也有独特之处。語言学的内容不及自然科学那样專門,容易引起較多的

群众参加討論。它又不像其他社会科学那样有显著的阶级性，不容易犯严重的政治錯誤。它的历史很久远，和数学、邏輯同为各科的基础，容易扩大影响。这些都是展开爭鳴的有利条件。

目前中国的語言学界，是不是已經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而展开了爭鳴呢？我認为还不算显著。我們还很少看到真正的大胆特識、不違背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而与众不同的文章。近几年来在語言学方面，我不断發現一些新的問題，深信并不違背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始終不敢提出。因为它显然像股逆流，縱然提出，怕也沒人肯理，更談不到發表。这以后，在“百家爭鳴”的号召之下，我也將尽量貢獻我的愚者之一得。也希望报刊的編輯同志們一面充分認清百家爭鳴的方針，一面进一步發揮学术为公的雅量。

当然，我們提倡百家爭鳴，最終的目的不是为了分道揚鑣，各树一帜，不是为了标新立异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为了相反相成，殊途同归，适应辯証發展的原則，为了联系实际，行之有效，为了提高祖国学术的水平，为了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想收到預期的效果，还需要極度的虛心、耐心，忘我为公和分工合作。这在語言学和其它学术里是沒有兩样的。

張寿康

党中央提出在学术研究中实现“百家爭鳴”的政策，这是使科学研究繁荣起来的源泉，就像“百花齐放”是使艺术界繁荣起来的源泉一样。

“百家爭鳴”，我理解为科学工作者在認識客观事物發展規律的过程中的不同意見的切磋、討論和科学工作者的批評与自我批評。

科学的任务在于發現并利用客观事物的發展規律。語言科学的任务在于發現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并利用它的內部發展規律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可是語言工作者在認識汉语或其他某一种語言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就認識得非常清楚的。在进行舍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的时候，每个人的看法是会有不同的，這些不同的看法一定要通过“百家爭鳴”，才能使真理愈辯愈明，达到發展科学的目的。

社会主义的偉大建設和向科学进軍的号召要求我們不仅要“鳴”，而且要“鳴得好”。“鳴得好”才能發展科学。在怎样“鳴得好”上，我有一些粗淺的意見。

首先是要明确“爭鳴”的目的。“爭鳴”的目的在于發展科学而不是“膠柱鼓瑟”。“膠柱”就不能把“瑟”“鼓”好，会觉得自己是“黃鐘”而別人都是“瓦釜”，会以为“鳴声嘶嘶”也是“鳴声惶惶”。在科学研究上应当提倡“廉頗精神”，廉頗之所以成为英雄，是因为他有英雄的本色，即虛心并勇于承認別人的优点和自己的缺点。在科学工作上也应当“先国家發展科学之急”，应当“以理服人，实事求是”，而不能因为“爭鳴”就失去科学的态度，使自己盛气凌人，甚至使人在字里行間也能听到切齿的声音。我們觉得，失去科学态度的人，在广大語言工作者面前是沒有威信的。

其次是要爭取“鳴之有物”。“鳴之有物”才能在“鳴”的过程中彼此啓發，得到參証。“物”不一定是“一鳴惊人”的“物”，只要对討論的問題有一定的啓發性的意見就应当“鳴”。这样的“鳴声”在發展科学上也有很大作用。当然掌握大量語言材料，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的意見是更加寶貴的，然而在百家爭鳴的开始，还不能就把弦兒定得这么高，弦兒可以逐步拉紧，逐漸地提高“爭鳴”的質量。

語言科学的發展远景规划草案已經拟出，这草案定稿后，將成为全体語言工作者的“作战計劃”。这个规划像建筑一座壯丽的大厦的藍圖，要盖成这座語言科学大厦需要全体語言工作者的努力。我觉得只要語言工作者辛勤地劳动，齐心合力地为实现这个远景规划努力，發揚“百家爭鳴”的精神，一定会提高語言科学的水平，使語言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广大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彭楚南

“百家爭鳴”的号召一提出，虽然馬上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同和拥护，但是紧跟着就有許多“清規戒律”从贊成者口中和笔下出現。这些不必要的清規戒律就是教条主义的表現。“百家爭鳴”的首要任务就是反对教条主义。

我同意“百家爭鳴就是一个出版問題”的提法。編輯部和編輯同志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視，更没有得到广大讀者和作者的諒解。大家都在談論着“家”，好像忘記了所有搞編輯的同志总起来也是一“家”。

有些作者表示自己的文章非刊登不可，并且一个字不能刪改，說这样才符合百家爭鳴的方針；甚至对編輯部發号施令起来。編輯同志一方面要尊重作者，一方面又要对讀者負責；而后者應該是更重要的。如果态度越坚决的作者，文章就越有必要登，那么編輯部將要变成收發室，把收到的稿件直接往排字房里送，最复杂的問題就要变成最簡單的問題了。編輯部的“独立思考”也將因此而取消了。

办一种“杂志的杂志”未尝不是解决問題的办法。編輯同志处理問題不会不犯錯誤，希望能在“杂志的杂志”中得到批評。某家之言可能在許多同类性質的杂志中得不到發表机会，也不妨在作为最后“上訴法庭”的“杂志的杂志”中發表(这个刊物必然是綜合性的)，并且可以由作为一“家”的編輯同志答辯。

既然百家爭鳴，編輯同志就不一定要拿出定論(事实上也往往不可能)。过去讀者責备編輯部沒有主張，沒有定見，今后應該是要請讀者多多进行“独立思考”了。

語言學界的特殊情况也要充分估計到。假如說苏联討論詞类問題已經得到解决，汉語詞类也就沒有問題，这是教条主义。

大家都在如飢如渴的时候，假如对窩窩头和高湯还要“評头論足”，这是不近情理。那些始終不拿出貨色来的同志必然会胜利地微笑說，“究竟还是我有眼光”。問題是，总的來說，大家少了許多應該有的公共財富。

为了怕批評，大家都不願意干辛辛苦苦的踏踏實實的可能被批評的工作。批評別人的工作倒可以一鳴驚人。結果是批評家多于被批評家，这种現象本身就值得批評。批評是为了促进学术的健康發展，而不是为了寻求自己的“天梯”。

甯渠

要在語言科學研究中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首先就要在刊物上保證有充分的学术討論自由，这是大家一致的認識。可是刊物是要給讀者看的，一个刊物的編輯部如果不为它的一定对象的讀者考虑如何服务，那是不可想象的。为了給讀者服务得好，經常地尽可能地滿足讀者的要求，刊物的編者就必须对讀者負責。

在“百家爭鳴”号召下，編輯的社会地位已被大家重視起来，这是好的現象。只要是徹底領會了“百家爭鳴”政策的精神的，沒有哪个刊物的編者会不拿出百倍精力来为学术上的爭鳴服务的。可是由于首先要对讀者負責，任何編者都需要考虑到下面三个問題：

第一，要做到实事求是，編輯部对于来稿的要求起碼是要“言之有物”，并且“言之成理”。不問作者是否已成为“家”，只要是在学术問題上“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当然都应该給以公开发表的机会。

第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不能不在若干来稿中下一番細致的选稿功夫。讀者注意的問題常常就出在这里，作者对刊物提意見最多的也多是这一过程；因为每个刊物都有一定的篇幅，不可能“来者不拒”。即使篇幅沒有限制，也不可能每一篇来稿都原封照登。因此，每一期只能在若干篇来稿中选取其什一或甚不足什一，这是一个很复杂而細致的工作。有的内容与另一篇重复，有的文稿冗話过長，有的論証需要磋商，情况不一。内容重复的不能不擇取其一

部，冗話過長的不能不要求壓縮，需要修改的不能不往返磋商。這還僅是一部分情況，就已經常常出問題，何況大部分是要退稿的。如果作者不是能虛心考慮退稿意見的，問題就更複雜了：不是說“壓制批評”，就是說“壟斷學術”，甚至到處“控訴”。給編者的帽子是扣不完的。

第三，由於這種情況，編輯部必須保留一定的修改權。每個刊物對稿件都需要有一系列的加工過程，主要的是文字加工。刊物的質量如何決定於原稿的質量，原稿的質量固然首先決定於它的作者，但是由於所發表的稿件起碼要在文字上由編輯部對讀者負責，所以稿件加工是編輯部的應有職責。可是有的作者常向編輯部提出“不能刪改一字”的要求，這種要求的是否合理，任何讀者都會清楚的。當然，編者在來稿的加工上必須尊重作者的原意和風格，決不能像“紹興文人”犯“削頭就筆”的毛病（參見《人民日報》1956年8月7日第八版《關於刪改》一文）。

為了貫徹執行“百家爭鳴”的方針，希望今後作者、編者、讀者能各自從對方立場來考慮問題，共同協力，打成一片。這才能使大家所關心的刊物能在學術討論上充分發揮它的作用。

楊伯峻 “百家爭鳴”的政策毫無疑義地是值得我們科學工作者歡欣鼓舞的，值得用百倍於前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來响应的。但是，也還有人為它耽心：“爭鳴”不要變成“亂鳴”，甚至流為“爭名”。這種耽心並非沒有根據。舊社會的許多惡劣作風直到今天還沒有“斬草除根”。譬如偷竊、剽襲，譬如為着証實自己的論點不惜曲解引文，甚至刪改引文，這種現象不是一再地遭到揭發嗎？我還認為目前有一個更為普遍而且危害性更大的現象沒有引起注意，這現象便是“空疏”。今天的出版物固然不算多，但也不能說是太少。真正缺少的是確有新內容、新心得而具有較高價值、較大作用的著作。有些文章儘管洋洋數萬言，有些著作儘管厚厚的一大本，按其實際，不是東拼西湊，濫調陳詞，便是廢話浮言，空無一物。還有一些，也許自己認為是新見解，但是論証不謹嚴，結論不正確，完全禁不起一駁。讀了它等於沒讀。不但如此，更其嚴重的是阻礙批評的正常開展，而不團結的現象便由此產生。因為這些著作並不是經過深入鑽研，精思熟慮，確有心得然後發表為文的，自然容易招致批評。而受批評的人不是虛心接受，勇于改過，而是鬧情緒，發牢騷，告上狀。於是乎一場學術論爭變了性質，由爭真理變為馳騁私人意氣，計較一時利害了。這類事實不止一件兩件，如果不加以糾正，是可能影響“百家爭鳴”的健康發展的。

防止的方法最好是提倡踏踏實實的學風，反對“空疏”。毛主席數“黨八股的第一條罪狀”便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這一警角今天還有着重地吹一吹的必要。而我認為，任何著作，凡是可要可不要的話都是“空話”；凡是沒有經過創造性勞動的，都不能算作“言之有物”。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必須踏踏實實地去追求真理。肯用踏實工夫的人，他的文章雖然不能盡善盡美，但總有其可取之處。即使只有百分之五的可取之處吧，也就多多少少地給人們帶來了益處。即使那百分之九十五遭受了批評，那百分之五還是不會被抹殺的。更其重要的是越是經過艱苦鑽研的著作，也就越需要對它艱苦鑽研，才能作出正確的批評。這樣，以艱苦鑽研對待艱苦鑽研，便足以促使我們的學術水平日益提高。而且，它還足以培養我們追求真理的誠意，服從真理以至堅持真理的決心。只有善於追求真理和服從真理的人才是確能堅持真理的人。這樣的品德，只有踏踏實實研究學問的人才會有。學術界如果把培養這一品德、使它蔚為風氣，作為每一個人的責任，批評和互相批評的利器也就能得着正確的運用了。

對於培養這一品德以至於釀成風氣，除開所有學術界的人“與有責焉”以外，學術界各級領導和刊物編輯尤其應該採取有力的措施。有些刊物只登已被組織的稿件，而不問其內容好不好；對於外來投稿，便輕易地將原稿退還，也不問是否有可取之處。即使選登外稿，首先考慮的是作者有沒有點名氣，題目時髦不時髦，而不是稿件的內容。這些現象已經遭受到有力的批

評。但是在一般的學術機構里有沒有類似的情況呢？不能說沒有吧。譬如高等學校的科學討論會，被選拔出來的公開報告的論文是不是都是優秀的呢？有沒有命題作文以便“應景”的所謂科學論文呢？有沒有只看作者、只看題目、不問內容的情況呢？我們不妨對這些問題深入檢查一下。在學術界，尤其應該防止冒濫，應該獎勵真才。真才得不到應有的獎勵，冒濫現象不斷地發生，空疏的情況便永遠不會得到根本的改善，踏實的學風便永遠樹立不起來。因之，今後評獎評級，學位學銜的授予，對於這一風氣有着巨大的關係。不但應該去掉偶像崇拜，去掉平均主義，而且也應該去掉至為庸俗的面子問題、照顧觀點。一個人只要政治上沒有問題，對他的學術品評只能用學術的標準，正如一般的工作上的品評只能有工作上的標準一樣。我認為：如果各級領導人物都在具體措施上獎勵真才實學，真才實學自然會多起來；如果都在具體措施上防止冒濫，幸進之心便可絕滅，空疏之病也會根除。那麼，踏踏實實的學風會自然而然地洋溢於學術界、技術界，“百家爭鳴”也就會健康地展開，十二年內接近世界先進水平的任務便更有保證了。

楊柳橋

解放以來，我最喜歡鑽研的是漢語語法，曾經打算綜合過去和當前的語法書，提出我的意見，寫一部《漢語語法問題》，向語言工作者們請教。由於自己是一個雜手兒，為了避免太幼稚、太主觀，只寫了一部分，便寄給研究機關和雜誌社，請求審核。可是，我所得到的，並不是一些鼓勵，而是種種的刁難，使我感到不寒而慄，喪失了信心，因而也就不敢繼續鑽研，一直擱下了兩三年。

自從1951年《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並連載了呂叔湘、朱德熙兩位先生的《語法修辭講話》以後，人們確實對語言這門科學的研究重視起來了。但是，在當時好像發生了一種偏向，大都認為這個《講話》是今後講漢語語法的準繩，不可任意侵犯。我提出一些對呂、朱不同的意見，我們的領導就對我說：黨報所發表的文件，就等於命令，我們要一律遵守。

當年12月間，葉聖陶先生到天津作過一次《語法漫談》的報告，在介紹《語法修辭講話》中，曾經提出：對於當前的語法問題，還是可以大家討論，並不是“只此一家，並無分處”。這個指示，在當時應該是有重要意義的。

現在黨及時地對各部門學科提出了“百家爭鳴”的主張，以上的問題，可以迎刃而解了。

我們一切為了社會主義，“百家爭鳴”當然也不能例外。我們的“百家爭鳴”，是為了深入問題，發掘真理，是為了實事求是，統一思想，而不是獎勵唯心主義，建立異端邪說，使人們的思想日益分歧。也就是說，我們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理論的指導下去“百家爭鳴”，而不是因為“百家爭鳴”就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要通过“百家爭鳴”來豐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內容，使它更鮮艷地放出燦爛的光輝。這便是我們當前向科學大進軍、迎接文化高潮的戰鬥中的辯證方法。《周易·系辭傳》中有這樣的話：“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這是我們的古聖先賢在社會發展中關於人類思想的經驗之談，直到現在，這種話還是值得我們尋味的。

具體到語言學界方面，專家們當然是有着不可埋沒的功績的；但是不應滿足於自己的成就而沾沾自喜、睥睨無人，不肯傾聽他人的意見，恐怕失去了自己的“尊嚴”。一般的語言工作者應該大膽地提出問題，根究問題，向專家們請教或展開爭論與批評，以便求得問題的解決。在領導方面，要設法給所有的語言工作者以大力的支持和更多的機會，例如擴大現有語文雜誌的篇幅，或另外出版《漢語研究》一類的雜誌，大量地刊登各方面不同意見的稿件，展開爭論；要瑕瑜互見，兼收並蓄，名符其實地展開“百家爭鳴”的局面。但是，這並不等於說，凡是濫竽充數、言之無物的稿件，也都在必須採用之列；內容必須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黎錦熙

为了向科学进军，才提出“百家争鸣”的号召。谈到语言科学研究中怎样貫徹“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以为首先要有保证，这保证主要在于出版，尤其是语言科学的出版。

高等学校的语文专业学生，很多在《语言学概论》的课堂讲授里熟悉了苏联的马尔学派。他们有的向教师问：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来说，咱们的马尔在哪儿？有的教师问到我。我给分析了一下：1. 马尔自成了一个学派，就是说，“成一家言”，咱们还“不够”。2. 马尔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实际有些“教条主义”，基本上倒跟马克思主义相反了，所以斯大林著论批判他。咱们倒是“够”这种现象的。3. 马尔门徒的作风是壟断本行，把持行政，巩固他一家独霸，扼杀了“百家争鸣”——这就正是咱们应当引为“殷鉴”的。

在中国，语言科学还是“冷行”，政策上虽然重视，实际上群众对它确实“生疏隔膜”，因此这一行更容易被“壟断”。出版包括专著、小册子和报刊，在中国，从前操纵在企业的资本家手里，近年加强领导，从事整顿，最近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到来，私营的出版业都公私合营了，领导干部和编辑同志要是不健全，有偏差，那么“行政”中的出版行政也是更容易被“把持”的。这两者一相乘，就可以扼杀语言科学的“百家争鸣”而有余。

拿马尔相比，既然第一点“学派”还够不上，不是学派就是“宗派”，宗派主义对于“向科学进军”的坏影响就更大了：第一，便利懒汉，可以不研究，研究也可以不深入，不再求广博。老话说的：“学一先生之言，暖暖姝姝（柔弱自悦的样子）”，但也能“厕于作者之林”。第二，便利莽汉，宗派有靠山，也得有防卫，对待异己的各种说法就可以大胆地瞎搬教条，乱扣帽子。所以说，在比较马尔的第二点上是不够的。总之，懒汉和莽汉的集合体，哪能成个“学派”“向科学进军”呢？不过是一帮人仗着宗派的力量来维持或发展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而已，这在中国历史上，就是那长期的百家不鸣、学术不能发达的时代。

现在，党和政府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最适时，最正确；如何贯彻，大部分体现在“出版行政”上。例如组稿、审稿，纸张供应，发行数量，都应当本着这种精神来领导。假如只看作一场运动，找几个表面的空洞的题目让大家“争鸣”一下，而实际存在的困难问题、复杂情况，倒掩盖起来，壅蔽读者，那么，争鸣的百家只可能达到“言之成理”的要求，不可能获得“言之有物”的帮助（要合起来才算“实事求是”）。这样的出版审稿的标准，难免使“百家争鸣”有名无实。必须克服旧时代的不良作风：《肃静回避》——这是7月19日《人民日报》上一篇短篇小说，特此介绍作结。

从“油票”的儿化说起

倪寄予

语言的两种形式——书面语和口语，从有文字起向来就是互为影响、互为因用的。要是从社会发展历史上看，任何语言都好像书面语倒后来居上，愈来愈占优势。这其中现象之一就是同音词的定型和分化作用。在口语（听的语言）里人们确是有时感到同音词的混淆，哪种语言也避免不了，这里也用不着罗列许多外国语例子；可是在书面语（看的语言）里，因为文字（拼写法）有定型，多数字有分工，人们不会感觉混乱。

这里说一个现代汉语的例子。新生事物中出现了“油票”这个名词，在书面上它同行用已久的“邮票”不会混同，可是说在口头上，人们听了就会相混。有人问你，“有 jupian 没有？”你会迟疑一会，究竟是“邮票”还是“油票”，少不了还得回问一句才弄清楚。但是，我们在口语（北京话）里可以有一个分化的办法，那就是把“票”字儿化，同“面票儿”一样说成“油票儿”，这样就同“邮票”划清了（“邮票”的“票”为什么不儿化，这是有关儿化现象发展的理论范围，需要另外细说的）。现在“油票儿”的说法并不新鲜，至少在北京已经普遍开来。

从这里可以说明两个现象：一者是现代汉语里词的儿化作用有很多好处，区别同音词就是其一，像上举例子还多得很。二者是书面语言形式同口头语言形式的矛盾是在不断克服不断产生的进程中的。还拿同音词现象来说，外国语言学者有以“上下文原理”（context theory）为标准来说明怎样划分“词”的，同样地，口语中在区别同音词的时候，也可以拿上下文来琢磨，因为有些同音词常是被用于不同的语言环境中的；语义色彩和语法结构都有一定作用，因而在这一点上，书面语同口语的矛盾也就长期处于辩证的统一之中。

汉字的笔画结构及其写法与计算笔画的规则

丁 西 林

笔画数目的用途

汉字的数目，依照《康熙字典》所收的，有四万多，其中十分之八九是废弃了的古字。现在通用的汉字，依照现代字典辞典和电报书本上所收的，有七八千。为了便于检查，我们必须有一项规则把这些字排定一个次序。中国一向所用的旧规则有三种：一种是依照字形结构上的意义分部，那就是普通字典辞典和电报书本用“部首”分部的方法。另一种是依照字的读音分部，那就是中国旧韵书上用韵母声母声调分部的方法。第三种是依照字的笔画数目分部。由于汉字的字数太多，若单用一种方法分部，则分出之后，许多部中所属的字仍然太多，因此必须要用另一种方法把由第一次分出的字作进一步的分部。例如旧式字典辞典和电报书本上的字是先用部首分部，然后再把同部首的字依照笔画数目排定次序。现代人编的字典也有先依照笔画数目分部，然后再把同笔画数目的字依照部首排定次序的。

以上说的是安排全部汉字的方法。在其他收字范围较小的情况之下，例如人名地名辞典、报纸杂志订户名册、一本书后面所附的索引目录等，往往只需要一次分部就够了。在这些情况之下，被采用的多半是笔画数目。在收字范围更小的情况之下，例如一篇“宣言”或者“缘起”后面的发起人，或者一个委员会的委员名單，在有意要表明名字次序不含有任何意义的时候，照例是“以姓氏笔画为序”。这些都说明汉字笔画数目的用途是相当广泛的，因此计算笔画的方法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

计算笔画旧法的缺点

为什么计算笔画的方法还需要讨论呢？因为一向所用的方法有一个大缺点，就是仅仅依靠它计算笔画，有不少的字可以一个字而有几个笔画数目。就问题的本身说，这已经是一件不能令人满意的事。就它的应用说，在利用它检字的时候，遇到一个数目不清的字，你得先在一个可能的笔画数目中寻找，找不到时，再到另一个可能的笔画数目中寻找。再就它配合地用在部首分部方面说，一个字应该属于哪一个部首，有时候就已经不能断定，因此，找一个字的时候，往往你得先假定一个可能的部首，再假定一个可能的笔画数目。你得在所有的可能的笔画数目中找尽，你才能断定你所假

定的部首错与不错；或者你得在所有的可能的部首中找尽，你才能断定你所假定的笔画数目错与不错。这是多麻烦多不经济的一件事！

计算笔画的基本原则

撇开文字学不谈，单讲实际，——那就是说，单讲一个字习惯上怎样写，不讲根据文字学它应该怎样写，——那末计算笔画的原则是：在写一个字的过程中，不管在哪里，从你的笔头落到纸上起，到你的笔头离开纸上止，不管它在纸上走的路是长的、是短的、是竖的、是横的、是直的、或者是弯的，统叫作“一画”。把它说得简单一点，就是：笔头离纸，加算一画。初看上去，这个基本原则再简单清楚没有了。现在让我们看看，为什么应用的时候它会出毛病。

汉字的笔画结构

汉字的主要笔画是下面的六种：

“丨” “一” “丿” “㇏” “㇀” “丶”
竖 横 撇 捺 挑 点

此外有三种次要的笔画，即(1)向下向右转弯的笔画，可以叫作“弯”，例如“乚”“乙”；(2)向左或者向右弯曲的弧形笔画，可以叫作“曲”，例如“乚”“㇏”；(3)不独立而只能连结在“竖”“横”“弯”“曲”末尾的短撇或者短挑，叫做“钩”，例如“乚”“㇏”“㇀”“㇀”“乙”“乚”“㇏”等。这些笔画在一个字中的结合形式可以分成下列的四类：

1. 分离的结构 字例：二 八 ㄥ 三 川 六
2. 相交的结构 字例：十 乂 丈 丰 卅 井
3. 相切的结构 字例：人 入 上 工 正 乍 非
4. 连接的结构 字例：厂 了 乙 己 弓 口 凹

以上四类笔画结构的前两类，即分离的和相交的，意义明显，不需要再加解释。后两类，即相切的和连接的，必须区别清楚，因为它们与计算笔画有密切关系。所谓相切，就是说一个笔画的头或者尾与另一个笔画的身段接触，所谓连接，就是说一个笔画的头或者尾与另一个笔画的头或者尾连接。四类笔画所举的字例是特选的，每一类中字例的笔画结构只包含所代表的一类，不包含其余的三类。不消说，一般的汉字多半是一个字包含几类笔画结构的，例如“世”“界”“和”“平”。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些笔画结构是怎样写的，应该怎样计算笔画。

字的基本規律。

造成(2)类和(3)类結構的笔画可以連写,也可以分写;我們不能根据写汉字的規律或者其他理論,說它們應該这样写或者那样写。但是造成(2)类結構的笔画習慣上都是連写,①造成(3)类結構的笔画習慣上都是分写。既然如此,我們就可以作一个实事求是的規定:(2)类笔画結構“依照習慣,連写,作一画”; (3)类笔画結構“依照習慣,分写,作兩画”。

(4)类笔画結構有一点小問題。多数有这类笔画的字都是連写,但有兩個例外,那就是“門”字和“鬥”字和它們所附屬的字。“門”字一向作8画,“鬥”字一向作10画。我們說这是小問題,因為我們可以規定這兩类字的右上角改为連写,“以昭划一”,把它們原来的笔画数目少算一画,这个問題就解决了。如果这两个字的右上角習慣上早已連写,或者这两个字本身將簡化为“门”和“斗”,則就更加沒有問題了。

(5)类的笔画結構是計算笔画数目真正困难的所在。因为汉字中有許多包含这类笔画結構的字一向是把它們連写,作一画;而另外有許多包含这类笔画結構的字一向是把它們分写,作兩画。例如

“乚”作一画

字 例: 乚 亡 山 凶 凹 匹 母 匣 弓 弟 丐 烏 鳶

笔画数目: 2 3 3 4 5 4 5 7 3 7 4 12 13

“乚”作兩画

字 例: 口 廿 甘 世 帶 巨 印 兜 姊 馬 烏 焉

笔画数目: 3 4 5 5 11 5 6 8 8 10 11 11

上述的这个笔画結構必須有一个原則,規定它在哪些字中、哪些地方應該連写,在哪些字中、哪些地方應該分写,否則在計算笔画的时候就沒有标准;如果連写分写,可此可彼,其結果就变成一个字可以有几个笔画数目。目前的情况是非常不科学的,例如独立的“凹”作5画,而裝在“兜”字头上的“凹”作6画;在“山”“凶”“幽”“屯”“芻”等字中扁一点的“乚”作兩画,而在“廿”“甘”“世”“帶”等字中長一点的“乚”作3画;“乚”形結構在“弓”“弟”“丐”“烏”“鳶”等字中是連写,作一画;而在“姊”“馬”“烏”“焉”等字中則分写,作兩画。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必須改变。不久,汉字在笔画結構上的字形就要规范化了,每一个汉字將只有一个規定的笔画結構,不能任意增减,也不能任意变更。在汉字笔画結構规范化的同时,我們对于与計算笔画数目有关的那些笔画結構的写法也必須加以規定,使每一个汉字只有一个笔画数目。

困难的解除

在本文以上各节中已經指出,根据写汉字的基本規律,絕大多数的笔画結構只能有一种写法,在計算笔

画上不發生問題。另外也有数目不小的笔画結構,虽然不能根据写字的規律断定它們是連写或者分写,但習慣上已有系統地分別的一律連写或者分写,因此在計算笔画上也不發生問題。剩下需要規定的只是上面所說的“乚”結構。对于这个一向未加管束的分子我們能不能把它們納入軌道呢?讓我們試試吧。

(1)規定所有字中的所有的“乚”笔画結構一律連写,作一画。这个規定是可能的,也很簡單,但它影响到我們写字的習慣太大了。依照这个規定,“口”字必須兩画写成;“東”“西”“黑”“白”“貝”“車”等字以及一切有四边形笔画結構的字,字中四边形的左下角都必須一律連写,而这些笔画一向都是分写的。

(2)規定所有字中所有的“乚”笔画結構一律分写,作兩画。这个規定也是可能的,也很簡單,但它影响到我們写字的習慣也很大。依照这个規定,“山”“凶”“区”“匹”等字以及一切有“乚”形或者“匚”形笔画結構的字,字中三边形的左下角,以及在“弓”“弟”“丐”“烏”“鳶”等字中的“乚”結構都必須一律分写,而这些笔画一向都是連写的。

(3)規定所有字中的所有的四边形笔画結構在左下角一律分写;所有字中的所有的二边形和三边形笔画結構的左下角一律連写。这个規定虽然比不上以上兩种規定那样干脆,但与我們写字的習慣最接近。依照这个規定我們只須把“廿”“甘”“世”等少数字中的“乚”結構和“姊”“馬”“烏”等少数字中的“乚”結構由分写改为連写就行了。并且,這兩种笔画結構在好些汉字中已經这样写了。

如果上面所建議的这个細微的改革能被接受,那么,汉字笔画結構的写法与計算笔画的規則就可以总结如下,而每一个汉字就只有一个笔画数目:

計算笔画的基本原則: 笔头离紙,加算一画。

写汉字笔画的基本規律:

1. 在同一笔画上,笔头只能走一次,不能走回头路。
 2. 写“橫”只能由左向右,不能由右向左;写“豎”、写“撇”、写“捺”只能由上向下,不能由下向上。
- 連接的笔画結構分写連写的規定:
1. 連接的笔画結構中的“厂”、“匚”、“乚”、“八”根据写笔画的基本規律,一律分写。
 2. 連接的笔画結構中的“フ”、“ㄣ”、“レ”、“く”“ \angle ”依照習慣,一律連写。
 3. 連接的笔画結構中的“之”、“了”、“ㄣ”、“ㄣ”依照習慣,一律分写。
 4. “乚”笔画結構造成四边形的左下角的一律分写,造成二边形和三边形的左下角的一律連写。

① “女”旁受“女”字的影响,一向作3画,可改作兩画。“之”在旧式字典上作4画,現已一般作3画。

字母表的字母順序問題

彭 楚 南

“字母表”是字母的总称，这些字母必須是有一定順序的。字母要有一定的公認的順序，那是很显然的。在學習字母的时候，在詞典的排列上以及其他許多应用文字的場合，都要有社会上一致的順序。

按照不同的需要和原則，字母表的各字母可以有不同的排列法。比方在普通的英文打字机上，26个字母从左到右是这样排列的：第一行 q w e r t y u i o p，第二行 a s d f g h j k l，第三行 z x c v b n m。在電碼、旗語、盲文等，字母的分配和排列又各不相同。在教学时，为了說明和了解的方便，字母(或音位)可以按照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排列成有条理的音位表，比方我国語言学家們对汉藏語系各語言的音位的处理就是。但是在各种順序中，有一种最根本、最普遍的順序——也就是普通所說的字母順序。用得最多的詞典排列順次就是根据这一順序的。本文討論的只限于这种順序。大家知道，这种順序在26个字母的拉丁字母表中是这样：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它的特点之一是具有普遍的国际性。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公布以后，字母的順序問題也引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見。本文打算把兩種重要的意見加以分析比較，表示一点个人的意見。附帶提出一些有关順序和排列的問題。

按 b p m f 排列的方法可以称为部位式，因为字母是按發音部位排列的。按 a b c d 排列的方法可以称为混合式，因为元音和輔音是混合在一塊兒的。主張這兩种方法的人都很多，意見一时还是相持不下。

主張部位式的理由主要是：(1)科学化，因为字母各放在它应有的地位上，比方 b p m f 是唇音，d t n l 是舌音；b d g ʧ ʤ z ʒ 是不送气的清音，p t k q ʑ ʎ 是送气的清音；諸如此类，容易學習和領會。(2)民族化，因为 ㄅ ㄆ ㄇ 排列的注音字母有多年的历史，中国古代音韵学的“見溪群疑”有着更久远的傳統。而且 a b c d 那种乱杂無章的次序是我国人难于掌握的。

主張混合式的理由主要是：(1)国际化，因为世界上所有采用拉丁字母表的文字毫無例外地使用混合式——而且只有一种 a b c d 的混合式(虽然有細節上的必要的差別)。(2)合理化，因为元音和輔音平均分配，在念字母表时和各种具体运用中有許多方便(比方不至于元音挤在一塊兒)。

在討論這個問題以前，这里先把世界上各种字母表的字母順序分析一下，是有好处的。正像上述兩大意見所反映的一样，世界上各种字母表(包括音节字母表)也有上述兩種主要的排列法。不过，音素化字母表(如拉丁、希臘、斯拉夫、阿拉伯、希伯来①、格魯吉亞、阿尔明尼亞等字母表)大都用混合式，而音节字母表(如日本假名、印度系的各種字母表②、Amhar 字母表等)大都用部位式。音素化字母表中有蒙古和朝鮮字母表(后者在应用中形体像音节字母表)用部位式。可見部位式适合于音节字母表，而混合式适合于音素化字母表。

混合式虽然有許多种排列的可能，但是由于音素化字母表的單一来源——起源于腓尼基字母表，所以几乎所有的字母表的字母順序都有“親屬关系”上的类似，而且都以 a 为第一字母：如拉丁和斯拉夫字母表的 a，希臘的 alfa，阿拉伯字母表的 alif，希伯来字母表的 aleph。有些音节字母表也以元音中的 a 为第一字母，如日本假名的 ア，印度天城体和大部分印度系字母表(西藏等除外)的 a。混合式的特点是元音平均地分配在各輔音中間，比方拉丁字母表的普通元音 a e i o u 后面各有差不多一样数目的輔音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部位式可以有兩大类：元音在先的和輔音在先的。这里並沒有强烈的一致性。比方日本假名、天城体和大部分印度系字母表③、蒙古字母表等屬於前者；朝鮮字母表、西藏字母表④以及我国的注音字母等屬於后者。

① 阿拉伯、希伯来等字母表沒有元音字母，但有元音符号，如果标上元音符号，就有些接近印度系各种字母表。原則上还可以归入音素化一类。

② 印度系各字母表的音节基本上是可以分析的，接近于阿拉伯字母表。

③ 严格地說，音节字母表每个字母大都含有元音。例如日本假名是 a e i o u, ka ke ki ko ku, 但是考虑字母表的輔音的排列次序时可以不談元音，比方天城体的輔音排列成 k kh g ɡṇ ṇ。

輔音在這些字母表中當然大都是按部位排列的(日本假名的輔音沒有很嚴格的部位順序),主要有兩種方向:(1)從后面的喉音到前面的唇音,(2)相反的順序。天城體,印度系統所有的字母表、西藏字母表、朝鮮字母表等屬於前者。守溫和尙的三十六母受天城體的影響,也屬於前者。注音字母屬於后者。但是要指出,這一原則並不是很徹底的。比方在天城體里,在五套很整齊的25個字母之后,是(這裡用拉丁字母轉寫)yrl v,ç(或ś) s sh,顯然不是按部位排列的。注音字母的順序“唇、齒、喉、舌面、翹舌、舌尖”也不是嚴格的前后部位。

世界各種字母表順序的簡單的敘述,應該說是對於漢語拼音方案採取混合式順序的主張者有利的。我也個人認為應該採用國際化的混合式。

混合式的順序是人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知識,儘管你不想學也不想用任何外國文,但是在數學中用的仍舊是a b c d, x y z,在音樂中是C D E F G A B,維他命分A B C D……等等,我們有什麼必要把它們改成b p m f呢?有人說b p m f容易記憶,那也沒有什麼根據。因為需要記憶字母表順序的人總是開始學字母而沒有分析語音部位能力的,那麼b p m f對於他又跟a b c d相差多少呢? f跟d, l跟g, h跟ç, x跟z之間又有什麼必然的聯系可以幫助記憶呢?其實26個字母順序的記憶是不費多少工夫的。根據人們學習和使用(比方說)英語的經驗,26個字母的順序一旦掌握住,經常在使用中重復着,鞏固着,幾乎成了人們的不自覺的無條件的反射。這是指一個人掌握一套順序說的。如果同樣的字母有兩套勢均力敵的順序,那麼麻煩是很大的,尤其是在長期的使用上。這就是為什麼世界上所有採用拉丁字母表的文字都絕對不例外地採用了a b c d的混合式。斯拉夫字母表的順序跟拉丁字母表稍微有些不同,如果說人們不致於把它們混淆在一起的話,主要是(幸亏是)因為它們不是一套方案,它們之間還存在着一定的形体上和發音上的差別。

再說, b p m f的順序的傳統也並非很長久,其中j, w, r和v等字母的地位也很有爭論。

當然,上面也說過,作為教學的手段之一,把字母或音位按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排列,像《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第一條所列举的那樣,是完全可以而且是有利的。這跟混合順序並不矛盾。混合式還是主要的、根本的,在詞典中使用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印刷體和手寫體都是以混合式排列的。

日本的假名除了部位式以外,還有iroha的排列法(混合式)。不過,兩種方式有比較嚴格的分工:詞典和大部分場合用部位式,iroha式只用在列举(像甲乙

丙丁一樣用)和其他少數地方。而且,iroha是一首詩,像《千字文》一樣,不重復地用47個字母組成有含義的詩,近乎文字遊戲。當然,我們也可以根據新的拼音方案創造出類似的詩句。

× × ×

現在再談談混合式中的幾個問題。上面說過,混合式中也有一些細節上的差別,那就是(1)新創字母的地位,(2)雙字母的地位,(3)少用字母的地位,(4)詞典中的總排列順序等。

(1) 新創字母,包括附加符號的字母,是許多語言的字母表所不能缺少的。它們在字母表中的地位問題有兩種處理方法:(a)放在形体或發音相近的字母后面,如ç在c后,η在n后。(b)或者將全部新創字母放在最后,比方瑞典語的å ä ö排在z后面,挪威語的æ ø å也排在z后面,丹麥語字母表的最末尾是æ和ø(或ö)。芬蘭語、愛沙尼亞語等以及用斯拉夫字母表的塔吉克語等等也一樣。採用前一種方法的比較普遍。《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印刷體和手寫體字母表也採用它。(a)式的優點是有形体或發音的順序根據,但是卻割裂了26個字母的完整順序。在列举時(代替甲乙丙丁),是否應該使用ç, η, η等字母,容易發生分歧。我認為採用(b)式是比較適宜的。

(2) 在《漢語拼音方案(草案)》中沒有雙字母,但是代用式中有。雙字母自然是代用的字母,那麼在代用式字母表中,雙字母就應該占據它所代替的字母的位置,比方...e ch d...n ng o...s sh t...z zh。這就意味着雙字母在字母表中有它們的地位。但是有些語言不“承認”雙字母在字母表中的地位,比方英語、法語、波蘭語等就是。這樣一來,雙字母在詞典中就把某一單字母起頭的詞割裂成兩部分,比方sh之前有s起頭的詞,之后也有s起頭的詞。這樣處理在漢語里是很不適宜的。雙字母也可以仿新創字母一樣都放在后面。

“承認”雙字母在字母表中地位的語言有,比方,西班牙語(ch, ll),捷克語(ch),越南語(ch, kh, ng, nh, th, tr)等。這種“承認”仍舊不一定意味著詞典中雙字母不把某一單字母起頭的詞割裂開來(比方越南語的ch等)。雙字母的順序有時也不按形体而按發音的近似排列(比方捷克語的ch[x]排在h[ç]后面)。

(3) 拉丁字母表中的c k q x v w y等在某些語言里有時很少用,有時甚至不用(比方芬蘭語的c q x等,羅馬尼亞語的k q y w等等)。《漢語拼音方案(草案)》也有一個v。有時它們被“承認”,有時又被“否認”,往往引起不一致。我認為26個拉丁字母無論如何都應該包括在混合排列的字母表中,這樣做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4) 詞典中(推廣到一切索引中)詞的排列是最關

重要的一个問題，也是字母表順序中最复杂的一个問題。光有字母順序还是很不够的。應該还有許多补充規定。比方有些語言甚至不承認新創字母（附加符号的字母）是不同的字母，把有附加符号的字母当作沒有附加符号的字母一样处理。比方捷克語的 *r* 和 *ř*，請比較下列各詞在詞典中的次序：*realista, řebčík, rebus, ě e ř, redakce, ředidlo, redigovati, řediti, refrén, řehot, rek, řeka*……。（但，請比較捷克語又承認 *c—č, s—š, z—ž* 的分別）。双字母的情况上面已經說过。有些时候，这些情况並沒有很严格的規定，因而發生了分歧的处理方法。(-*r*)和 *ř*(-*r*)的情况特別要注意。

在漢語里，新字母和双字母應該被承認並且在排列上占有独立的地位，这是容易为大家所接受的。但是采用像英語那种足以引起分歧的“習慣的”排列法的人也不是沒有的。希望《漢語拼音方案》吸取教訓，在这方面加以严格的規定。

尤其容易引起分歧的是漢語的声調符号。相同的音节(或相同的元音，結果会有些不同)按四声及輕声分先后呢，还是先不管四声，按字母排列，如果碰到不同声調的同音詞再按四声先后排列？比方“馬”“卖”，“麦子”和“埋怨”，按第一种办法排成 *máiyān, mǎ, mài, màiz*，按第二种办法排成 *mǎ, mài, máiyān, màiz*。这样的分歧將触目皆是。問題的答案在很大的程度上有賴于标調問題的解决，而意見的分歧也將归結到标調方法的爭執上。如果字母全标調（放在音节后），那么用第一种方法是方便的。如果主張文字中不全标調（詞典中可以全标），即部分用符号在字母上面标調，那么就要用第二种方法才是方便的了。無論如何，方案必需及早把这个问题解决，給以严格的規定。因为方案虽不是正式文字，但是一經定案，所有的詞典、索引、目录都要使用它。將來要翻案和修改是很不方便的。

对句型名称的意見

黃誠一

謝永仁同志的“語法修辭講話”的教学体会一文①是一篇根据教学实践写的文章，提出了不少切合实际的意見，如建議增加構詞法、詞类划分标准、積極修辭材料等，这是應該肯定的。但是也有些地方不很妥当，現在提出来向大家請教。

謝同志补充了下面这些句型名称：

- 1) 主語句： 貴姓？ 筆記本呢？ 一九四七年的春天。
- 2) 謂語句(無主句)： 很好。 好的。 好極了。 下雨了。 失火了。
- 3) 單詞句： 行。 好。 对。
- 4) 主謂句(双成分句)： 我去。

这里就有引人困惑的地方。“好”是單詞句，“很好”是謂語句，这好象意味着單詞不能决定是不是謂語，加上“很”字才能成为謂語。

作者所举的这三个例子都是“应諾副詞”，似乎單詞句不包括“誰？”“我”这种句子。但是对初学語法的人說，“应諾副詞”和“形容詞”也不容易一下子就分清楚。

主語句的三个例子，都是名詞詞組，好象意味着主語只有名詞才能充任。其实其他詞类也可以做主語，名詞也可以做謂語。何况所举“貴姓”一例，正是名詞謂語中的謂語，如果添全，一定是“你貴姓？”，怎么能說是“主語句”呢？既然謂語句叫無主句，当然主語句該叫“無謂句”了。但“貴姓”这一主語的謂語是什么呢？

再者，句子不但有它一定的內涵(完整的意思)，而且有它一定的結構形式(句子形式)。那些單部式的句子，或是一項省略，或是一項潛在，或是由上下文托襯，或是不能援例的習慣語。不能單独拿出一个單詞就叫單詞句，加上一个附加語就叫主語句或謂語句。我觉得謝同志那样补充是不妥当的，至少四种句型并列起来是不妥当的。

① 見《中國語文》1956年3月号。

文学語言对全民語言体系的关系*

P. И. 阿瓦涅索夫

一 几句前言

1 文学語言的概念,在各个具体語言的發展的不同时代,在說这些語言的人的历史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目前虽然有不少关于文学語言的定义(这些定义有时是相互矛盾的,由于各人把文学語言的不同的特征当作它的本質的特征而产生的),但是直到今天,我們对于文学語言还没有一个統一的,大家一致的了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处理这一概念时缺乏历史主义观点。

由于对于文学語言历史的理論上的諸問題尚無充分研究,下面提出的各項論点只是作为討論的材料,不是什么解决这个問題的結論。

2 确定文学語言的概念时,必須首先把它同書面語的概念分开。的确,一般說来,文学語言同时又是書面語;但是除去書面形式外,文学語言还具有口头形式。口头形式的加工程度在各个时期是不相同的:在某些历史情况下,它几乎是書面語的單純的口头的实现,即書面文章的“讀音”;在另一些情况,即文学語言很發展的情况下,它具有自己的特点,其中包括它所特有的風格。一个民族的現代文学語言的口头形式并不比它的書面形式用途小,在某种意义上說还要更广泛些(由于無線电广播)。

还应当注意到,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存在着口头的“文学”語言,比如法律的和外交的程式(指在沒有文字的社会里)或是民間文学的語言,这都是和人民的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用的語言有所不同的。但是,由于文学語言功用的复杂和多种多样,口头的“文学”語言在有文字的部族和民族的文学語言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一般是有限的,虽然在个别时期这种作用是显著的。

假如說文学語言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書面語,那么,另一方面就可以这样說,不是所有的書面語同时都是文学語言。那些未經加工的日常生活語言或事务語言的直接記錄,虽然完全屬於書面語範圍之內,可不是文学語言。語言的巨匠們对語言加工和錘鍊的程度乃是文学語言的最本質的标志之一。

3 應該把某些語言(如捷克語)之中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發展的民間会話語(它主要是諸方言削去特

点的結果)同文学語言的口头形式区别开,前者(在諸方言之間有很大差別的条件下)是諸方言使用者之間的交际工具,同时(在諸方言使用者不懂文学語言的条件下)又是文学語言和諸方言使用者之間的交际工具。

4 文学語言不同于日常生活語言和事务語言,其不同点首先在于:文学語言服务于文化範圍,这里所說文化指最广义的,在社会的历史的不同阶段上内容不同的(拿現在來說,它包括科学和技术,思想活动的範圍,艺术,尤其是語言的艺术,等等)。

5 最后,还应当把文学語言的概念同文学作品語言的概念划分开。文学作品是文化的一个方面,它运用文学語言。同时,文学作品对文学語言本身的發展有很大的意义,它可以大大促进文学語言的加工、錘鍊和丰富。但是,文学作品为了反映現實的多种多样的現象,根据需要也可以求助于語言之中任何其他非文学的类型(俗語的、方言的、同行語的,等等)。

6 这样,我們可以認為以下几点是文学語言的本質的标志:

(一)文学語言除去有書面形式外还有口头形式,随着民族語的發展这种口头形式的使用範圍大大地扩展着;

(二)文学語言是經過語言巨匠們加工和錘鍊的語言;

(三)文学語言服务于文化範圍的各方面。

7 文学語言与非文学类型的語言之間的界限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在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程度的明显性。在一些情况下,这些界限划分得十分清楚和确定,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則相反,这些界限極不穩定,客观上很难确定。

8 文学語言和全民語言之間的相互关系,或者說文学語言在全民語言体系之中的地位,由于文学語言所服务的那个社会的性質不同(部族、資產階級民族或社会主义民族,而其中的每一个又可以处于不同的發展阶段),因而在不同的語言和在一个語言的不同历史时代,可以是很不相同的。

* 在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議(1955年6月)上的报告的提綱。

因此文学語言和全民語言的相互关系这个問題乃是另一个比較广泛的問題——部族語和民族語——的一部分。

二 全民語言和地方方言

1 文学語言在一些情况上处在全民語言範圍之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成为全民語言的組成部分。因此，全民語言和地方方言的概念，虽然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和独立的問題，在研討文学語言对全民語言的关系时不能放在一旁不管。

2 全民語言和地方方言不是彼此不相关的两种东西，而是同一东西(部族或民族語)的多种形式。方言的相对独立性在各个时代里程度是極不相同的：在某些时代里(比如在封建割据时代)它逐渐扩大，而在另一些时代里(比如在發达的資本主义时代，在一定条件下)它逐渐縮减，一直縮减到方言失掉自己的独立性，溶合在民族語言里并且消失在它里面为止。

3 个别方言的日益增長的独立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使这些方言發展为新的独立的語言。由此产生了該語言——部族語或民族語——的基础方言問題(可能在全部历史过程中只有一个基础方言，也可能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基础方言)。

4 在語言史上的一定时代——距今較远的时代，——方言曾是全民語言的唯一形式。由于諸方言間的差別在不同語言里和一个語言的發展的不同时代里是不相同的，因而全民語言的統一的程度可能差別很大：在一些情形下方言彼此很接近，而在另一些情形下相去較远，在第三种情形下远到足以使說个别方言的人之間的語言交际在某种程度上遭到困难。在后兩種情形下，“超方言的”民間会話語可以得到發展，說各种方言的人們之間的語言交际就借助于它来实现。

在另一些时代——距今較近的时代——随着规范化类型的語言的不断加工和更广泛的扩展，方言逐渐变为全民語言的低級形式。这些时代的方言逐渐削去特点，逐渐向规范化类型的語言接近。

在这些时代全民的語言規範的發展一般是和文学語言的历史紧密联系着的。

三 文学語言对全民語言的关系

1 大家知道，文字是在社会發展的一定阶段上出現的。尽管部落語常常沒有文字，部族語之中有些有文字，也有些無文字，民族語是至有文字的，因为民族語所服务的資本主义社会永远离不开書面文学語言。所以書面文学語言的存在是民族語的本質特征之一。

2 文字的出現对于全民語言的进一步發展有一定的影响。最一般的影响是：文字的存在通常是阻止

語言的进一步变化，促使書面語的規則化(規範的逐漸确立)，促成語法結構特別是句法的改进和整頓。但是，这种影响的形式和性質以及其强度都可能是很不相同的，依赖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依赖于社会的發展水平，人民中識字的普及程度，書面語对全民語言的关系的性質，也依赖于为文化性質所制約的文字本身的性質)。

3 在一个部族具有文字的情况下，極其重要的一点是这种文字的基础是什么样的——是外来的还是全民的。大家知道，在資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与全民語言無关的書面語曾經是很發达的(比如西欧各族人民用过的拉丁文，突厥各族人民用过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以及蒙古用过的藏文和滿文)。这些書面語本身代表着一定的利益，可是它們只是微乎其微地反映全民語言的成分(比如只在地名，人名和某些名称里反映)。在一些情况下，除了外来的(根据語言基础來說)，服务于某些社会需要(宗教的，文学的和科学的需要)的文字之外，同时也曾存在着以全民語言为基础的，服务于另外一些需要(比如法律的，公文，日常生活的需要)的文字。除此而外，有时还可以指出一种文字的特殊变体，这种文字变体按其語言基础來說也是全民的，但它却是以民間詩歌語言的傳統即民間創作为基础，为發展着的文学作品服务。

确定一下这些不同类型的書面語是不是各自独立，各自成为語言系統，还是在它們之間存在着一定的相互作用，这是很重要的。这种相互作用以及書面語每个类型与全民語言之間的相互作用都需要仔細研究，因为没有这样的研究不能解决文学語言对全民語言的关系的問題。

4 就上述的这种关系說，古代俄罗斯的情况是極其特殊的。它不仅以全民語言为基础的，服务于外交、法律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書面語，同时还有一种狭义的文学語言，它的基础虽然是外来的，却是亲屬关系很近的(即以古斯拉夫語为基础的所謂教堂斯拉夫語)。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基础各不相同的書面語类型之間的相互作用，更好是叫做相互滲透，是特別广泛的。因此，教堂斯拉夫語的这种近亲的基础成了丰富和改进文学語言的極重要的补充源泉，連續不断地，直接地与东斯拉夫人千年的文字傳統相联系着的俄語文学語言广泛地利用了这个源泉。

5 最后，对一个部族語來說还有一点很重要：文字的历史有多久，是具有悠久的傳統呢，还是剛出現不久。如果文字有悠久的傳統，那么書面語体系中的傳統成分的比重自然可能是特別的大。在这种情况下，甚至那种以全民語言为基础的書面語也会由于保留許多过去的，已在活的全民語言中不用的事实而与活的

全民語言有显著的分歧。文字的許多体裁（如法律條例）的傳統性同样也是很重要的，在这些体裁里已成为成語的一些僵化的組合和程式时常是以同一形式世代地重复着。

6 書面文學語言的各種体裁的發展依賴于文化、教育的性質——有時是教會的和學院式的，但有時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宗教的和“啓蒙的”。書面語的豐富或貧乏，它的体裁的多样化與否，在文學語言的各個類型的性質上有显著的影響。從書面語的其他類型中把文學作品語言分離出來，這對於文學語言的未來的歷史是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的。由於文化和教育的一般性質的不同，文學作品語言的分離在一些情況下是在民族以前的時期（在部族的書面語中），在另一些情況下是在由部族向民族發展的过程中。

7 部族語發展成民族語是部族本身隨着封建割据的消滅，共同市場的形，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向民族發展的結果。就我們所研究的問題說，部族語向民族語的發展有以下几点特征：一方面，以別種語言為基礎的書面語逐漸縮小其使用範圍，最後變成一種“特殊的”語言（祭祀的語言，以及在一定時期內的科學的語言），另一方面，以全民語言為基礎的書面語逐漸擴展其使用範圍，這種書面語起初大都只運用在一定的實際範圍內，比如（就某些語言說）運用在事務性的和法律性的文字里。這種類型的書面語在擴展它的使用範圍的过程中以下列方法改造了自己，豐富了自己：（一）借助於它與全民語言的方言形式以及與具有外來基礎的書面文學語言之間的相互作用，（二）借助於借詞（由於和鄰近民族直接交際的結果而產生的直接借詞，以及通過書面方式從書籍里得來的借詞）的辦法。換句話說，這一類型的書面語逐漸獲得那種具有廣泛的全民基礎的文學語言的性質，並且後來逐漸成為文學語言的唯一形式。

資產階級民族形成時代所特有的一些過程促進了文學語言的進一步發展和豐富，這些過程是：書面語的功能與形式的進一步複雜化，文學作品的進一步發展（在許多情況下）和繁榮，以及從前未曾有過的各種形式的口頭公開言辭的廣泛發展。

四 語言規範是歷史範疇，語言規範的性質，它在各個時代的普及程度

1 任何類型的語言，包括方言在內，都具有自己的體系，也就是說都有自己的“規範”。但是，規範具有自己的特殊的質，因此只有當這個術語用在書面的文學的語言上的時候，“規範”才取得它的基本的和特殊的意義，因為這個時候的問題在於建立那種使地方的變體服從自己的，全民的“超方言的”規範。

2 大家知道，文字的發展能促進書面語的確立和它的規範的逐漸形成。書面語的規範是同等地涉及部族語言的各個方面，還是在比較大的程度上涉及到一些方面，而不涉及到另外一些方面，這是很重要的問題。可以想像得到，各種語言由於具體的歷史條件不同，情況也不一樣。但是我們有根據可以說，在多數情況下，書面語的規範首先是涉及語法結構和詞彙，在較大或較小的程度上不理會語音系統，因為語音系統實質上在文學語言的書面形式里不存在。根據許多語言的材料可以判斷，語音規範都是在民族語發展的較晚的時代形式。書面語的一個特殊方面——正字法的情況一般是很複雜的。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正字法的規範是極其不穩定的，常常使得活的口語——這個或那個方言的語音特點有可能在書面語里反映出來。在另一些情況下，有一種比較確定的正字法建立起來，但是這種正字法常常包含有大量的歷史的和傳統的書寫法，反映着語言的先前的狀況，或是從別種語言里輸入的詞語（比如俄語里含有古俄語或者古斯拉夫語的書寫法）。傳統書寫法常常影響到人民中有文化的人的發音，從而引起所謂讀書音的一些特點，這些特點以後可能有一部分成為民族語的規範。

3 語言的規範就在部族的文學語言里也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發展。但是在部族的文學語言里，規範一般不越出書面的文學語言的範圍，也不越出那些掌握書面的文學語言的人的文學的口語的範圍。正在形成的規範在初期對民間口語，對全民語言，沒有影響，或者是只有不大顯著的影响。這種影響隨着民族語的發展漸漸增長，在有發達的民族語存在的條件下它就有很大的影響。

4 這樣看來，民族語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規範性。規範化的語言在某一種語言的使用者當中的擴張，代表着前邊說過的方言的萎縮和方言喪失其特殊性這一過程的另一面。

民族語的規範化的和經過文學加工的类型是民族語的高級形式，並且有成為民族語的唯一形式的趨勢。然而，由於方言一般都有很强的穩固性，因而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這種趨勢通常都不能充分地實現。

5 民族語在規範化方面的基本的特征就是作為口語里特殊規範的總合的正音法的逐漸建立。正音法是隨着民族語的發展而歷史地形成的。雖然規範化的因素在距今較遠的時代里就已產生，但是他們在這些時代或者是沒有涉及口語，或者是在很小的程度上涉及口語；在這些時代，因為口頭的公開言辭不發達，對正音法的要求是不大的。正音法的作用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大大地擴大起來，因為這個時候各種形式的口頭公開言辭廣泛地發展着，這是要求有一套統一的語音的。

6 民族語的正音規範的總和對個別類型的語言(城市的或是方言的)的關係,在各種語言的歷史上是極其不相同的。正音規範的形成通常是以在該語言分布的中心地區(以首都為首)之內占統治地位的一種語言類型(方言)為基礎,這個中心地區對該社會的生活有着特別重要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意義。在方言分歧很利害的情況下,民族語的正音規範可能不是直接與一個特定的方言相聯繫。

7 民族語的规范化對民族語的進一步變化起阻礙的作用。語音系統和語法形式的系統通常基本上穩定下來了。進一步要做的只是對它們加以最後的整理,清算掉語法形式和發音里的搖擺現象,消除個別的古代殘留下來現象。但是,句法系統,特別是詞彙,仍將繼續發展、豐富和趨於完善,以滿足日益複雜和日益多樣化的各種社會需要(由於各種口頭的公開言辭、各種體裁的文學、政論、科學和技術等方面的巨大發展而產生的需要)。由此可見,民族語不僅在功能的複雜化上,就是在它的性質上也同部族語有根本的差別。

五 文學語言是民族語的組成部分

1 上述的資產階級民族形成時代的各種語言過程——一方面是文學語言發展的性質和方向,另一方面是方言特殊性的消失——使一個民族的文學語言逐漸變為民族語的經過文學加工和規範化的高級類型,這一類型不僅具有書面形式而且還具有口頭形式,它隨着自己的發展與鞏固,對方言發生越來越顯著的影響,促使方言所特有的特點消失並促使方言向民族語的規範接近。

從此應該得出這樣的結論:民族語是一個由該語言的在功能和風格上以及在地域上有質的不同的各種形式組成的複雜的有很多支派的體系,這個體系以經過文學加工和規範化的類型為首,作為民族語的高級形式,同時也包括民間口語的全部多樣性。民族語的

全民性在於它是該民族所有成員的財產,這些成員在實踐中都使用着民族語中的由歷史所制約的諸多變體之一。

2 社會主義民族,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是“比任何資產階級民族都團結得多,因為它們沒有那些腐蝕資產階級民族的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而且他們全民性遠遠超過了任何資產階級民族”。(《斯大林全集》,第11卷,293頁,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這種特殊高度的團結不能不對這些語言過程的性質和方向發生影響。社會主義民族的經過文學加工和規範化的語言類型在這種條件下有可能在人民大眾中間毫無限制、毫無阻礙地推廣。方言的削弱、方言特點的消失以及方言向民族語的规范化類型靠近的過程在這時變得更加急劇。各社會主義民族的語言隨着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文化的普遍高漲和文學的發展而豐富和改進自己,文化革命為民族語的統一的、全民的、規範化的類型變為社會主義民族每個成員的財產創造了先決條件。

但是,由於具體的歷史條件不同,這些一般的過程在各個社會主義民族的文學語言歷史上有其獨特的、互不相同的表現,各個社會主義民族發展過程的獨特性,特別是首先以社會主義建設開始之前——對於蘇聯各族人民來說是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對於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各族人民來說是以偉大的衛國戰爭之後以工人階級為首的進步力量取得勝利以前,——所達到的社會發展水平為條件。

為了在一般理論的平面上,解決上面所提出的那些問題,必須按照前面所擬定的提綱以各種語言的材料為基礎進行一系列的研究。這些研究能闡明各個文學語言在其與全民語言的相互關係上向前發展的具体道路。同時這些研究還能使我們上面所提出的一些論點得到更充分的論證,另一些論點得到修正,並可能在一些情況下推翻某些論點而代之以新的、更符合實際的論點。

(陳鵬譯,呂叔湘校)

補 正

本刊1956年7月号鄭之東同志《朝鮮的文字改革》一文最末段前面補加下面一節:

從朝鮮的文字改革工作的成就和經驗,我們能夠從中得出什麼必要的認識呢?我們以為有如下四點值得重視:

(1) 首先進行文字改革工作能為文化革命造成十分有利的條件,掃除文盲工作可以迅速在短時期內完成,普通教育年限可以縮短,工农大眾文化水平可以提高,對於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合作化是非常有利的。

(2) 朝鮮文字改革的經驗證明:在人民的政權之下,用拼音新文字本身的簡單合理、容易學用取得人民的支持,讓新文字代替舊文字為廣大人民所使用,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在有了改革的條件和準備之後,還得採取勇敢的堅定步驟,不然新

的拼音文字是行不開的。

(3) 把重形不甚重音的漢字改為拼音文字,總要發生一些困難和問題。同音詞問題是存在的而且應當研究出辦法來解決。拼音文字是應當造得適當地精密的,但是決不能把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才拿出來,而是把主要的問題先解決,在實用中再逐步解決繼續發生的問題。文字拼音化,收效和成效將是主要的、巨大的;問題也有,但是可以逐步在實踐和發展過程中解決。無論如何不能因噎廢食。

(4) 擬制拼音文字方案,走音素化的道路是正確的。朝鮮的橫寫新文字,無論楷體、草體都是把原來的以音節為單位的方塊式的結構打破,改為音素化的文字,以方便於橫行排印書寫。我們如果採取本來便於橫排橫寫的音素字母,而不再搞成繁雜的音節文字,可以得到更多的便利,並且在科學、技術和文化的發展上獲得很多利益。

論京劇語音改革問題

翠 庵

最近有人提出關於京劇語音改革的問題。本文從京劇藝術如何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角度出發，並充分照顧到舞台藝術的特點，對這一問題試圖作一些初步的研究，希望能得到進一步的討論。

一 改革的前提

在今天的條件下，束縛京劇語音發展的“清規戒律”已經完全有必要而且也完全有可能取消了。因為我們的京劇藝術是為廣大人民服務的，不像過去專為那些閉起眼睛、用手指扣着板眼來“聽”戲的有閑階層的人服務的，所以就要求在形式上（包括語音）越容易為群眾接受越好，也就是越能叫群眾聽得懂越好。只有這樣，才能使京劇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更好地發揮它的教育作用，也只有這樣，它才可以為更多的觀眾所喜愛，因而也就會更加促進它的發展。

問題是在於究竟怎樣改革。是否需要把從前的京劇語音系統完全推翻而重建一個新的語音系統呢？是否需要完全按北京音來規定京劇的語音呢？它的改革應該以什麼為前提呢？這裡，我們先提出以下三點：

（一）作為民族戲劇優秀代表的京劇，它雖然不是在北京土生土長的，而是漢調、徽調、昆腔等地方戲形成的，但是，從現在的語音情況看，它的方言色彩是很淡薄的。而且，恰恰相反，它却是受北京音影響最深的一個劇種，它的語音絕大部分與北京音相同（當然也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如[æ]字的發音在京劇中較北京音更後一些，又如“我”[uo]可讀為[ɲuo]，這種以[ɲ]為聲母的情況也是北京音中所沒有的）。從實際的情況上看，京音在京劇中的運用和影響已越來越擴大和深

入。從前，也有些京劇進步演員曾大膽地採用京音，並且得到觀眾的歡迎。今天看來，這個方向應該肯定是正確的。因此，當我們要確定一個京劇語音的標準時候，首先就是北京音。

（二）京劇已經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戲劇。在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已作為一個政治任務而展開的今天，以北京音為標準來改革這個全國性劇種的京劇語音就有着非常積極的意義。

（三）但是，改革京劇語音不能因為要使它易於為廣大人民接受和更有效地為推廣普通話服務而僅從語言的角度來考慮，還應該從舞台藝術的角度來考慮，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京劇是載歌載舞的戲劇形式，它是在舞台上唱給人們聽的。這就需要注意到語音的清晰性和明確性，語音的音域是否廣闊，音節是否洪亮。如果不照顧到這一特點，只一味強求以北京音為標準，我們認為也是不妥當的。

二 怎樣進行改革

這可以分兩部分來談：一部分是應該取消的，取消以後的語音應以北京音為準；一部分是要加以保留和強調的，它們雖不同於北京音，可是應該合理地存在。在這一部分中，也牽涉到關於聲調以及十三轍諸問題。

（一）應該取消的“清規戒律”^①

凡屬於下列情況的一律取消，以北京音為準：

1. 所謂“庚亭部”的字，如“命[mien]”、

^①此部分應與下一部分結合起來，凡不屬下一部分所強調和保留者，都在應取消的“清規戒律”之例。

“令[liən]”、“生[sən]”等一律改[ən]为[en], 并入中东辙。

2. 在北京音中讀[su]而在京劇中讀[sy]的字如“書”、“叔”、“梳”等一律改为北京音。

3. 凡北京音讀[tɕu]而在京劇中讀[tɕy]的字如“朱、祝、燭、囑、竹”等一律改为北京音。

4. 有些以[i]收尾的字, 如“微”(讀vi, 其实在[v]与[i]之間还应有一元音[e], 但占的分量極微, 所以略去不計)“飞”(讀fi)等应照北京音的讀法, 都以[ei]收尾。这些字用[ei]收尾后, 即并入“灰堆”辙, 不再屬“衣齐”辙。

5. 凡在京劇語音中以[u]为介音而在北京音中屬开口呼的字, 一律去掉介音[u]。如“战[tɕuan]”、“風[fuən]”、“捧[p'uən]”等字都应去掉元音[u]。

6. 其他如“乳[ɹəy]”、“那[no]”、“說[syɛ]”都应照北京音讀为[ɹu]、[na]、[suo]。又如“知[tɕi]”、“日[ɹi]”应去掉韵母[i], 而分別代之以兩卷舌韵母[ɹ]和[ɹ̥]。

(二)應該強調和保留的部分

1. 圓唇高閉后元音[u]的問題

在北京音中, “步[pu]”、“哭[k'u]”、“母[mu]”、“渡[tu]”等字的韵母[u]是圓唇高閉后元音, 而在京劇語音中的[u], 虽有高閉后的特点, 但嘴唇都是微扁的。試举二例:

A. “霸王別姬”崔柳子虞姬唱:

i i 3 i 65 6 60 06 56 43 5 35 5 65 61 5
輕 移 步
○

B. “秦香蓮”倒板包拯唱:

3 325 3 ... 4 3 2 1 2 ... 3 3 2 ... 02 123 5 • 1 2 ...
包 龍 圖 打 坐 在 開 封 府
○

从这两个例子来看, 如果我們把“步”、“圖”、“府”的韵母[u]用扁唇来發声的話, 那就会縮短口腔共鳴的距离, 会使人感到它較圓唇的[u]更豁亮、更清晰, 也沒有圓唇[u]的重濁之感; 并且, 这样發声对不挂髯口的角色來說(主要指青衣、花旦和小生而言), 还有

一个好处, 那就是保持了口型的美觀。

我們認為, 扁口的[u]既然有又好听又好看的兩層优点, 那就完全有提倡和強調的必要。而且, 这样做也决不会同别的字混淆起来, 也不会使人誤解为别的字, 因为这种情况在北京音中只有一种, 所以, 尽可不必多虑。

另外, 圓唇半高后元音[o], 也应以扁唇發声, 理由与上述相同, 就不多說了。

至于圓唇全高前元音[y], 在京劇語音中, 也应该以扁唇来發声。比如, “打魚杀家”蕭恩唱“父女們打魚……”一句搖板, 如果把“女”、“魚”二字的韵母[y]用扁唇唱的話, 音域就会更廣闊一些。这对青衣、花旦等不挂髯口的角色來講, 用扁唇發[y]同用扁唇發[u]一样, 都有保持口型美觀的作用。

2. 韵母[un]、[yn]、[in]和[un]、[yn]、[in]的問題。

在“失街亭”这出戏中, 孔明一出場所念的定場詩的韵字是頗饒兴味的:

忆昔当年居臥龍 万里乾坤掌握中
扫平狼烟归汉統 方显男兒大英雄

这里, “龙、中、統、雄”四个字的念法和北京音显然是不同的。它不念[luŋ]、[tɕun]、[t'uŋ]、[ɕyn], 而念成[luən]、[tɕuoən]、[t'uoən]、[ɕyeən]。

再如, 当我们听譚鑫培的唱片“卖馬”和“捉放曹”的时候, 就可以很清楚地听到他把“店主东帶过了黄驃馬”的“东”字和“陈宮心中乱如麻”的“宮”字讀为[tuoən]和[kuoən]。

我們認為这种唱法也是行腔所需要的, 它不仅音域寬闊、洪亮, 而且也清楚、好听。如果照北京音的念法, 即用[tun]和[kun]来唱“东”和“宮”的話, 那么, 观众除了听到很重的[n]鼻音而外, 是很难听清楚这个字的。我們曾听到一位京劇爱好者講: “唱‘店主东’的‘东’字, 必須先發一‘多’字, 然后再和‘翰’字拼起来, 否則就很难听, 而且也不利于行腔。”这的确是經驗之談。

至于[in]和[yn], 在京劇語音中应讀

为 [ieəŋ] 和 [yeəŋ], 而且 [eə] 音較明显, 如“冰” [pieəŋ]、① “窘” [tɕyeəŋ], 这都是行腔的特点所决定的。

此外, 同 [uŋ]、[yŋ]、[iŋ] 相类似的 [un]、[yn]、[in], 在京剧語音中同 [uŋ]、[yŋ]、[iŋ] 的情况差不多, 只有很細微的区别。下面可以举兩組例字对照看一下:

	(京音)	(京剧)
“冰”	[piŋ]	: [pieəŋ]
“窘”	[tɕyŋ]	: [tɕyeəŋ]
“龙”	[luŋ]	: [luəŋ]
“宾”	[pin]	: [pien]
“君”	[tɕyn]	: [tɕyen]
“論”	[lun]	: [luəŋ]

从“冰、窘、龙”和“宾、君、論”的比較来看, 它們除收尾不同(一收 [ŋ], 一收 [n])外, “冰、窘”二字还比“宾、君”二字多了一个中元音 [ə]。这种情况也不难理解, 因为“冰、窘”兩字当收 [ŋ] 时, 舌的方向是从 [i]、[y] 向后移动的, 所以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中元音 [ə]; 而“宾、君”的收 [n] 是前收, 舌的方向是从 [i]、[y] 向前方移动, 这样, 自然不会出现中元音 [ə] 了。

这里, 还需要談一下的是, 在北京音中以 [iŋ]、[yŋ]、[uŋ] 为韵母的字, [i]、[ŋ] 之間, [y]、[ŋ] 之間, [u]、[ŋ] 之間都应有一中元音 [ə], 只是因为这个过渡音非常輕微, 一般都不計算在內; 但是在京剧里由于行腔的需要, 这个中元音 [ə] 就非常明显。所以一定要計算在內, 不能略去。

3. 收音應該全以十三轍为准。

根据每轍韵母性質, 可归納为三大类:

A. 單元音韵母五轍

衣齐(包括 [i] [y], 或有兩卷舌韵母 [ɿ] [ʅ], 姑苏 [u], 發花 [a], 梭波 [o], 也斜 [ɛ]。

属于这类的字, 唱时直出無收。口腔、唇舌都应保持一定位置, 直到行腔完畢为止, 不能改动, 否則, 即易使听众發生誤会。

B. 元音尾韵母四轍, 又分为二:

1) 收 [i] 者(旧說“收噫”)有怀来(韵母 [ai])、灰堆(韵母 [ei])二轍。但应注意, 收 [i] 并不是要把 [i] 明显地發出来, 而只是当行腔完畢之后, 口型作一發 [i] 时的姿势。过去京剧界所一致推崇的名演員言菊朋对京剧語音有精湛的造詣。他在“烏盆計”(上海百代公司唱盤)中唱完“家住在南陽城关外”这一句时, 可以很清楚地听出在“外”后紧跟一“噫”字, 这个“噫”字大概拖了有一拍那么長的时间。我們認為, 这样唱法容易引起听众的誤会, 同时对戏腔韵味醇厚也沒有任何好处, 所以不主張采用。

2) 收 [u] 者(旧說“收鳴”)有天条(韵母 [au])和由求(韵母 [ou])二轍。其理同收 [i] 一样, 不再細說。

C. 鼻音尾韵母共四轍, 又分为二:

1) 收 [n] 者有言前(韵母 [an])和入辰(韵母 [ən])二轍。

2) 收 [ŋ] 者有江陽(韵母 [aŋ])和中東(韵母 [əŋ])二轍。

这一类与第二类不同处, 在于它在收尾时并不仅作一發 [n] 和 [ŋ] 的姿势, 而且还要切实發出声来; 这在淨角的唱腔中表現得尤其明显。因为这一类的四轍能够充分發揚淨角唱腔的雄壯、磅礴、渾厚、共鳴性强的特点, 所以它多适于構成淨角唱詞的韵脚。

4. 声調問題。

北京音声調只有陰平、陽平、上、去。它們的調值分別为 55、35、214、51。并且在不同的場合下, 調值也有变化。上声字在陰平、陽平、去声字之前时, 不念出它原調值的上升部分, 而讀成半上声。例如, “滿”为上声, “門”为陽平, 但連續念“滿門”的时候, 其調值不是 214、35, 而是 21、35。另外, 当兩上声字連念时, 第一个上声字的調值即变为陽平。例如, “斬首”連念时, 上声“斬”念成陽平, “首”不变。但是, 北京音所具有的这些声調規律,

①这个“冰”字不是旧謂“庚享”部之“冰” [pien], 而是照京音讀为 [piŋ], 又因为京剧行腔的需要, 所以 [piŋ] 是 [pieəŋ]。

几乎完全不适用于京剧的歌唱部分(包括念、引、韵白、行腔)。我們知道,在歌唱的时候(指一切可唱的东西),一个字的調值的高、低、升、降完全取决于乐譜,而不是根据它在口語中的調值;所以一个字的調值在歌唱中往往与口語不同。

例如,“打魚杀家”中,蕭桂英唱的一段原板里有“老爹爹[清晨起,前去出首]”这一句,其中“老爹爹”三字分屬北京音上声、陰平兩类,調值应为 214、55;但是在唱詞中,它們的調值随着乐譜而变成 53、 $\dot{1}\dot{1}$ 、76 三种新的調值。而且同一个“爹”字,在这句唱詞中就有 $\dot{1}\dot{1}$ 、76 兩種調值。

李少春先生在《京剧与京音》^①中談到京剧四声的問題,并且举了“来在府門抬头看”这句唱詞为例,認為老派念法是“賴宰夫悶太透坎”,但他接着說:“現在的念法,已經有所改进了。”这話的意思很使人难解:这个“改进”到底是怎样“改”法呢?是否要改得和口語一样呢?我認為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因为一个字的調值在歌唱中不是根据口語,而是取决于乐譜。

5. 尖字問題。

所謂尖音,是指舌尖前音 [ts]、[ts']、[s] 而言,尖字是指在上口字中以舌尖前音發声的字而言。其实,京剧語音的所謂尖字,都屬於北京音以舌面前音 [tɕ]、[tɕ']、[ɕ] 發声的字的一部分(也有个别的情况,如“初”字,京音讀为 [tɕ'u],其声母为舌尖后音 [tɕ'],但在京剧語音中,它也屬於尖字,讀为 [ts'u])。我認為这一点仍有繼續保留的价值。因为在北京音中,“积”与“記”發声相同(都是 [tɕ]),“秦”与“勤”發声相同(都是 [tɕ']),“小”与“曉”發声相同(都是 [ɕ])。在說話的时候,这些字由于声調以及話語上下文意思連貫的緣故而很容易分辨,但用于歌唱場合,情况就不同了。上面已經談过,一个字的調值在歌唱中往往是不同于口語的,所以,如果

我們要把这一部分京剧語音中所固有的尖字取消而全按北京音的标准来念的話,这就必然會出現“秦王”与“勤王”相混、“不小”与“不曉”相混的情况。

另外,以京音的舌面前音 [tɕ]、[tɕ']、[ɕ] 發声的字,在京剧語音中除一部分成为尖字而外,其他的字的發声也不同于京音。以“家、恰、下”三字为例来看,其声母各为京音的 [tɕ]、[tɕ']、[ɕ],但在京剧語音中,其發音部位則略后于舌面前音。

由此可見,京音以舌面前音 [tɕ]、[tɕ']、[ɕ] 为声的字,京剧里就分成兩部分,這兩部分表示从 [tɕ]、[tɕ']、[ɕ] 的發音部位向前、向后的兩個方向的移动。向前方移动者形成了以舌尖前音 [ts]、[ts']、[s] 为声母的所謂尖字,这一类可以“精、清、心”为代表;向后方移动的形成了以“見、群、曉”为代表,其声母發音部位略后于舌面前音 [tɕ]、[tɕ']、[ɕ] 的字。

尖字用于京剧語音的作用,即在于它把讀音相同因而容易相混的字截然分开,可以使語音的明确性更巧妙而有力地表現出来。

最后我想附帶地談一下:一般人都有京剧有些难懂的感觉。可是我認為难懂的主要原因决不單純是由于有些字与京音念得不同,因为京剧語音的大部分都和京音相同。我認為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由于京剧唱腔有真嗓、假嗓之别,前者又包括生、淨、老旦、丑,后者包括花衫、小生,而它們彼此之間,又各有其剛、柔、寬、細等不同的特点。其他如唱詞的費解以及行腔时对声、韵头、韵腹、韵尾的过分講究等等情形也加深了京剧的难懂。

小 啓

《拼音》月刊是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的,已在八月十五日創刊。讀者如有同該刊联系事項,請直接寄交北京景山东街 45 号該刊編輯部,不要交本刊轉,以免往返費时。

本刊編輯部

① 見《中国語文》1956 年 5 月号。

太原人學習普通話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

王 立 達

一 山西省方音分布的概況

山西省的方音很複雜，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晉中方音（通稱為“中路話”），以太原話為代表；一是晉北方音（通稱為“北路話”），以大同話為代表；一是晉南方音（通稱為“南路話”），以臨汾話為代表。這三種方音的區別主要表現在聲調上，即晉中方音平聲不分陰、陽（注、王無別，通、同不分）而保存着入聲（利、力有別，時、實不同），入聲並且分為“陰入”、“陽入”二類（八、拔有別，督、獨不同），所以合計起來，共有五個調類。晉北方音雖然也保存着入聲，可是沒有“陰入”、“陽入”的區別，不過因為平聲有陰、陽之分，所以也是五個調類。至於晉南方音則入聲已經消失，分別派入其它聲調，而平聲則有陰、陽之分（天、田有別，潘、盤不同），所以它的調類與普通話相同，也是分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類。因此，從語音上來說，晉南方音中的“河東方音”（臨汾、永濟等縣）與陝西省的“關中方音”相近；而其中的“上黨方音”（長治、晉城等縣）則與河南省的“豫北方音”相近。由此可見，方音區域與行政區域並不完全一致：晉南在行政區域上雖然屬於山西省，但在方音區域上則與陝西省中部及河南省北部屬於同一系統；所以在考察山西方音時，不能夠拿晉南音做為調查研究的主要對象，應該首先來研究晉中方音中的太原方音；因為太原是全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它的方音是具有代表性的。

二 太原方音和普通話的主要不同點

(1) 聲母：主要是舌尖後音的ㄐ（知）ㄑ（痴）ㄒ（詩）與舌尖前音的ㄆ（資）ㄑ（雌）ㄒ（思）不分，而ㄉ（日）則讀為舌尖前音的[ʒ]。這樣，就使得太原人學習普通話時感到很大的困難，甚至常發生矯枉過正的現象，例如把“私人”讀為“詩人”，把“資本主義”讀為“支本主義”，如果連在一起讀時，“私人資本主義”就變成為“詩人支本主義”了。

(2) 韻母：主要表現在鼻聲隨韻母（ㄌ、ㄋ、ㄏ、ㄍ）的混亂與變質。這種混亂、變質現象，可以歸納為下列三種類型：

1) ㄌ、ㄋ 不分：亦即把舊日庚青蒸諸韻的字與真文侵諸韻的字讀為一類，韻母都是ㄌ。北京的相聲演員有

時就拿這一點做為模倣山西人說話的材料。老舍先生在他的《牛天賜傳》小說里也曾用讀“公民”為“公明”、讀“國文”為“國翁”來形容書中一位山西籍的教師。

2) ㄋ 失掉鼻聲隨[ŋ]而變為 ㄩ。這樣，就把舊日江陽韻的字與麻韻的字相混（江、家不分，忙、麻不分）。因此，太原人就會把中藥材的“麻黃”與食品的“麻花”讀為同音。

3) ㄍ 失掉鼻聲隨[n]，分為兩類：“開口呼”和“合口呼”的字分別讀為[æ]和[uæ]，“齊齒呼”和“撮口呼”的字分別讀為[iɛ]和[yɛ]。比如，太原人說“宣化”（河北縣名）時，很容易被北京人誤聽為“雪化”。

(3) 聲調：太原方音中共有五個調類，就是平聲、上聲、去聲、陰入、陽入。它同普通話的調類相較，有下述兩個不同點：

1) 平聲不分陰陽，其調值為 111。例如，天與田，千與前，通與同，潘與盤，滔與桃，蹻與喬，欺與騎等字，在普通話當中，分得很清楚；就是在山西省的南路方音中，也夠辨別出它們在聲調上的區別。但是，在太原方音中，卻完全讀為一個聲調。這種平聲不分的現象，很值得我們注意。王輔世先生的論文中有一張“漢語古調類在現代方言中的現代調類和調值對照表”，①列舉了 23 種現代方言，其中只有太原一地平聲不分陰陽。由於平聲不分陰陽，當地人說“王先生”時，就很容易被誤聽為是在招呼“汪先生”。

2) 保存着入聲，並且分為陰入、陽入兩類。細說起來，就是舊日群、定、澄、並、奉、從、邪、牀、禪、匣等十個全濁母的入聲字為“陽入”，其調值為 444；而其餘全清、次清、次濁、半清半濁等二十六母的入聲字為“陰入”，其調值為 42。這樣，由於保存着入聲，所以“勢利”和“勢力”在普通話中讀為同音，但在太原話中卻能夠分辨出兩者的不同來。因為“利”字讀為 [li]，是去聲，其調值為 744；“力”字讀為 [liə]，是陰入聲，與“立”、“歷”等字同音，其調值為 42。又如“和”、“合”二字，在普通話中讀為同音，北京市的中小學學生們在作文時常有把“我和你”誤寫為“我合你”的錯別字現象；但是在太原話當中，這兩個字的讀音卻能夠分辨得很清楚。

①《怎樣分析和記錄漢藏語系語言的聲調》，見《中國語文》1956年6月號。

再說“与”类連詞在多叠并列中的位置

蕭 斧

“与”类連詞对于并列詞語的主要作用，与其說是在連接，不如說是在界画。根据汉语語法的傳統規律，三叠以上并列詞語里的“与”类連詞，應該加在概念的等类差別之間。筆者的《“与”类連詞在多叠并列中的位置》一文^①，曾經根据王力先生的見解^②，对这个論点有所闡述。而关于“与”类連詞的位置，还有一种格式可以补充，就是在三叠并列詞語之間用兩個“与”类連詞；例如：

(1) 广大根据地的丧失和紅軍的轉移，这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失敗，不是永远的和全部的失敗，虽然这个局部是包括了党和軍隊和根据地的百分之九十。(毛澤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4)

(2) 气忿和失望和凄凉，使伊不能再掘那牆角上的新洞了。(魯迅《兔和貓》)

(3) 古人又以“虹气”、“云气”連称，……則对于虹与云与气之間，他們都不加区别了。(聞一多《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3)

(4) 看着这个肿子的……優样兒，便禁不住地引起人的同情与憐憫与爱撫的心腸来。(繆崇群《更生》)

同样的用法也偶或出現在欧洲語里^③，而这种格式其实是从古代汉语沿襲下来的^④；要說明这种格式，須先举些文言和初期白話的例句：

(5)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論語，子罕》)

(6) 然則我与与人俱不能相知也。(《庄子，齐物論》)

(7) 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龙，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史記，周本記》)

(8) 世之攻文艺与詩与禪者，計伯为社。(《守望社題詞》)

(9) 圓鞠小桥梁与圭門与窰窰墓穴者曰刀磚，又曰鞠磚。(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埴》)

(10) 行者寻着唐僧，和那龙馬，和那行李。(《西游記》88)

(11) 于是把一样兩張印信割付，并吏兵二部勘合，并詰身，都取出来，放在桌上。(《金瓶梅》31)

“与”类連詞在这些句子里的作用，可以概括地分做兩类。

第一是句調的作用。以(5)來說，添上兩個与字，只是为了足句的要求^⑤，使它湊成兩個四字的音句^⑥；也就是《馬氏文通》(三之二)所謂“語欲其偶，便于口

誦”。以(7)來說，与字的有無，正是《文通》(七之一)所謂“为辭緩急之別”。杀之、去之、止之，不是一举而卜三个方法的吉凶，而是先后相繼的三次占卜，用緩辭才能表达連續的情态。总之，就句調作用而論，与字之类其实只是一个音节，它的身份同一般語助詞相似。^⑦

第二是語法的作用。以(6)來說，添上兩個与字，是避免把“我和你和别人”誤会做“我或别人”(比較：“祖若父”)。以(8)來說，“文艺”是双音詞，“詩”和“禪”是單音詞；不添与字，不是絕對沒有誤会做“文艺、詩禪”或“文、艺、詩、禪”的可能。以(9)(11)來說，也無非使并列詞語画分清楚，正是《文通》(三之二)所謂“欲求醒目”的意思。总之，就語法作用而論，它們只是詞語的并列关系的標記，因此不妨称做“界詞”。

現代白話中运用这种格式，也不外乎這兩种作用。下面是句調作用的例子：

(12) 把一串不断的時間来划成年，分成月，更細切成日与小时与分，其用意也在此。(郁达夫《国道飞車記》)

① 見《語文學習》1953年3月号，39頁。

② 參看王力《中国現代語法》上册，384頁；又《中国語法綱要》，38頁。

③ 高名凱《普通語言学》下册，221頁說：“欧洲語的情形，在一大串的并列关系之中，最后一个并列关系之間大半加上一个連詞。……但是有的时候，也可以因为着重或其他的原因把連詞加在別的地方。例如英語的 Workmen and peasants and students gathered immediately in the place”。

④ 楊伯峻《文言語法》，181頁說：“与字一般表示实体詞的并列关系，有在几个并列成分之間每一銜接处用一个的，”看所举例子，也只是三叠并列詞語之間用兩個与字。超过兩個的絕對罕見，如“杀晉君，与逐出之，与以归之，与复之，孰利？”(《國語，晉語》)

⑤ 这里的“句”不是語法上的名称，而相当于呂叔湘先生所用的“小句”或“頓”，見《中国文法要略》上册，163頁。

⑥ 音句是对义句說的。音句中的逗号，如例(5)，只标明停頓，不标明結構，因此可以称做“修辭上的标点”或者“音节的标点”，見陈望道《修辭学發凡》，开明版354頁，新文艺版231頁。

⑦ 郭紹虞《中国語詞之彈性作用》一文中說：“助声之辭，只在音节上有足句的作用，不在文法上有意义的作用；易言之，只表現語句之神态，而不表現語句之意义”。見《語文通論》，31頁。

中型現代漢語詞典編纂法(初稿)(中)

鄭 冀 孫德宣 傅 婧 邵榮芬 麥梅翹

第二章 注音

一 語音標準

1 注音的標準

詞典的注音以受過中等教育的北京人的語音為標準，北京話中某些詞過土的讀法，詞典中不收。

2 異讀的選擇原則

中型的現代漢語詞典，是一部規範性的詞典，因此，同一個詞，如果在北京話中存在着異讀的，原則上都應當確定一種讀法。過去的字書和詞典里，採取自然主義的方法，把幾個音都注出來，這種辦法，對規範性的詞典來說是不合適的。但是寫法相同的漢字，可能是不同的詞或是不同的復音詞里的詞素，那麼，不論它本身的來源是否相同，如果有不同的讀音，應當分別保留。根據這個原則，我們對於異讀可以採用下面幾種辦法處理：

(1) 同一個單音詞或同一個復音詞里的某一個詞素，如果有幾種不同的讀法，而其中一種是舊來傳統的讀書音(舊日韻書反切的音)，現在讀書時已經不這樣唸了，這種讀書音應當廢除。近來出版的一些詞典往往還把這些舊來的讀書音也收在詞典里(可能是為了遵循舊音或照顧方言)，這完全是不必要的。現代漢語普通話應當以現在的北京音為標準。如：

今讀	舊讀
賤 取 P'í (zéi)	不取 P'í (zé)
肉 取 Ròu (roù)	不取 Ròu (rù)
肋骨 取 Rìgǔ (lèigǔ)	不取 Rìgǔ (lègǔ)
蟋蟀 取 Tī P'X'è (xīsuài)	不取 Tī P'X'è (xīsuò)
碩士 取 P'X'è P' (suòs)	不取 P' P' (s' s'ì)
芍藥 取 P'è l'è (sháujàn)	不取 P'X'è P'è (suòyè)

(2) 同一個單音詞或同一個復音詞里的某一個詞素，如果有兩種不同的讀法，其中一個是現在的讀書音，一個是現在的口語音，在一般的情況下，應當以讀書音為領導。因為讀書音多保存在復音詞里，應用的範圍比較廣，例如“避”，讀書音唸“bì”，口語音唸“bì”（避風、避雨），但是在“逃避、迴避、避免、避諱、避雷針”里，“避”都唸“bì”不唸“bì”。其他方言的人學習普通

話時，學會了讀書音有很多方便。

	讀書音	口語音
把(把書拿來)	取 Bǎ (bǎ)	不取 Bǎ (bǎi)
誰	取 Shéi (suéi)	不取 Shéi (séi)
摸	取 Mō (mo)	不取 Mō (mau)
仙鶴	取 Xiānhè (xianhè)	不取 Xiānhè (xianháu)
顏色	取 Yánsè (jānsè)	不取 Yánsè (jānsái)
剝削	取 Bōxiū (buoxye)	不取 Bōxiū (bauxiau)
血壓	取 Xuèyā (xyèja)	不取 Xuèyā (xièja)

(3) 同一個單音詞或同一個復音詞中的某一個詞素，如果有幾個音(可能同是讀書音或口語音)而這幾個音在北京話中都非常普遍，那就參照北方其他方言和古今音演變的規律，選擇其中與其他北方方言或與古今音讀演變規律相合的音做標準音。如：

[與大部分北方方言或古今音演變規律相合的音]	[與大部分北方方言或古今音演變規律不合的音]
耕 取 Gēng (gēng)	不取 Gēng (qīng)
剿 取 Chāo (qiǎo)	不取 Chāo (qāu)
粽子 取 Zòngzi (zùngz)	不取 Zòngzi (zùngz)
波浪 取 Bōlàng (buolàn)	不取 Bōlàng (puolàn)
纏綿 取 Chánmián (qianqén)	不取 Chánmián (ganqén)
診療 取 Zhěnlǐáo (zěnlíáo)	不取 Zhěnlǐáo (zenlíáo)

(4) 入聲字的聲調在北京話里很不穩定，往往同一個入聲字在聲調上可以有幾種讀法。按照入聲字在北京音系中分配的一般情況來說，次濁的入聲字多歸入去聲調，全濁的入聲字多歸入陽平調，但是清入聲字分配得就很亂，很難找出一定的規律來。因此同一個入聲字如果在同一個詞里有幾個不同的調，除了根據以上各項的辦法處理外，可以按照它比較普遍的讀法來決定。

語里含有几个詞义。如果是多义詞时,其次就該考察这几个意义之間的派生关系。普通用的現代漢語詞典沒有必要考求全部詞义的历史和来源,但在可能範圍內指明某些詞的現存詞义之間的派生关系,还是有必要的。現代漢語中多义詞的各个意义之間的派生关系不外下列三种:基本义和引申义的关系,基本义和借喻义的关系,基本义和轉移义的关系。

(1)基本义和引申义的关系:

基本义是一个詞的現存詞义中,在派生关系上最根本的詞义。基本义有时就是本义,例如,“笑”的基本义是“喜欢时臉上的一种表情”,①同时这也就是“笑”的本义。但当一个多义詞的本义在現代漢語里已經死亡,詞典里不加注明的情况下,基本义就不是本义,而是本义的派生义。例如,“兵”的本义是“武器”,后来这个意义死亡了,代替它的意义是“拿着武器保衛国家的人”,現代漢語詞典里前义不收,后义就变成了“兵”的基本义,而后义是前义的派生。

引申义是由基本义扩大或縮小而得来的派生意义。它和基本义之間保持着概念上的“种”和“类”的关系。如果是扩大方式的引申,則基本义是“种概念”,引申义是“类概念”;如果是縮小方式的引申,則基本义是“类概念”,引申义是“种概念”。例如:

麵(名)麦子磨成的粉。||一斗麦子,就拿出~來說,也比別人家的多出三四斤。(短选,182) ⑤粮食磨成的粉。||小順(人名)家晚飯是谷子~干粮豆面条湯。(赵,选,41)②

(按此是扩大方式的引申)

人(名)由类人猿發展而成的、会說話、能使用生产工具的最高等动物。④(代)某人以外的或某些人以外的人。||况且他們一翻臉,便說~是惡人。(魯、訥,16)

(按此是縮小方式的引申)

(2)基本义和借喻义的关系

借喻义是取基本义的某一特征去比喻具有类似特征的事物或現象所得到的意义。例如:

鉄(名)有色金屬之一,灰白色,有光澤,富延展性,在潮湿空气中生鏽。③||~做的釘子。⑥(形)坚硬而不易变动的。||这就同做了一场欢喜夢一样,醒轉来还是看見絕望的~臉。(叶、选,227)

包袱(名)布塊連同它包着的东西。||大家都悄悄地穿好衣服,打好~,靜候命令。(茅、选,164) ⑥不利的負担。||在历史政治問題上有隱瞞欺騙的人,把自己的历史政治問題徹底交代清楚...就能够使得自己卸下~,更積極地投入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报)

(3)基本义和轉移义的关系

轉移义是基本义采取既不同于引申方式,也不同于借喻方式轉变而得到的意义。它和基本义的距离通常比較远。例如:

花(名)植物的繁殖器官,有各种形狀和顏色。

||現在冬天了,~落了。(楊、三,93)

⑧供欣賞的植物。||夏太太因为买了四盆~,而被女僕楊媽摔了一盆,就和楊媽吵鬧起来。(老、选,230)(形)1.顏色、綫条、虛实等交錯配合的。|| (电话机)光亮的色彩同板壁的黯淡对比,像~手帕挂在乞丐的身上。(叶、选,313)2.模糊不清的。||眼都给一堆花花綠綠的行李弄~了。(高玉宝,73)

疼(形)动物因較强的刺激或損伤所引起的难过的感觉。||長瘡就够~的了,揭咯咬更~!(老、方,96) ⑨很亲昵的爱。||可是你也得知道我是真~你。(老、选,194)

3 如果詞义之間是并列的派生关系,或派生关系不明时,都分条平列。

4 分析詞义时不要被詞运用于个别語句中的具体环境所拘,必須抽出詞义的最大概括。也就是說要把詞的修辞意义和詞的詞彙意义区别开来。否則就要失于繁瑣,以致發生錯誤。例如,“架上淨是科学書”和“淨說不幹”兩句里的“淨”都是“沒有別的东西、單純”的意思,如果我們拘于具体环境,認為第一句里的“淨”是“全”的意思,第二句里的“淨”是“只”的意思,把它們在詞典里并列起来(見《同音字典》),不免失之于繁瑣。

5 分析某些詞的意义时,可以采取比較的方法。凡是具有同义詞或反义詞的詞應該把它和它的同义詞或反义詞放在一塊兒来观察。通过全面的比較研究,才能更确切的了解一个詞的意义。在詞义的說明里,然后能把一个詞和它的同义詞或反义詞的真正同或异充分表达出来。例如:

再 表示事情的重复,主要指未實現的。

又 表示事情的重复,主要指已實現的。

天气 大气在短時間內的变化現象。

气候 一段时期里天气反复变化中的常态或規律。

厚 物体兩平面之間的距离較大的,薄的反面。

薄 物体兩平面之間的距离較小的,厚的反面。

驕傲 过高的估計自己,瞧不起別人。

謙虛 不以自己的成就为滿足,尊重別人。

① 引自《新华字典》。

② “面”还有一个轉移义,指“面条”,此处不录,这里举出的詞义以能說明問題为限,下仿此。

③ 引自《新华字典》。

6 漢語的詞發展到現在,往往在其某些意義上只能作詞素,也就是說它的這些意義不能單獨出現,只在作為其他詞或成語的組成部分時出現。在分析詞義時,這些不能獨立出現的詞素意義不在該詞下注出。例如,“極”作為詞來分析時,只要注明“達到頂點的”這個意義就行了;另外“頂點”這個意義只在“南極”、“陽極”、“兩極”等詞及“登峰造極”等成語里出現,就不加注明。構詞能力很強的詞素,按照第二章的規定收入詞典中作為一條,它的意義可以在該條下注明。例如,“木”字在“木頭”、“樹木”等詞里出現的詞素意義“樹一類植物的通稱”,在詞素[木]下注出。

7 現代漢語中早已不用了的詞義,詞典里不收。例如,“的”的“鮮明”的意義,“極”的“棟梁”的意義,“鳥”的“長尾禽的總名”的意義等等。但對那些目前雖然不用或很少用而在五四以後一段時期常常應用的詞義,應該收入詞典中。例如,“幹部”的“主要部分”的意義,“(生活)程度”的“(生活)費用”的意義,“機關”的“靈巧的結構”的意義等等。為了和現代活着的詞義區別,這些詞義應該標明為舊義。

8 詞的方言意義或用法,例如,“听”的“用鼻子嗅”義,“走”的“跑”義,“匹”的“山的單位”的用法等,詞典里不收。但已經為普通話所吸收的詞的方言意義和用法,例如,“搞”的不帶褒貶意味的用法,“部”的“車的單位”的用法等,詞典里應該收入。

9 注明詞的新產生的意義,是現代漢語詞典的一項重要任務。解放以來,很多詞產生了新義。例如,“文化”的“語文和科學的一般知識和技術”的意義,“情況”的“敵情”的意義,“關係”的“與黨、團等的組織上的聯繫”的意義等等。應該把這類新產生的意義毫無遺漏的納入詞典中。

10 詞典里應該注明詞的詞類。在漢語語法專家們劃分漢語詞類還沒有取得一致之前,詞類的劃分原則可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學課本的系統為依據(本編纂法舉例和樣品中所注詞類的總原則是注兼類,不注變類。因為是暫定辦法,不作為詞典注詞類的原則,此處也不逐條舉例)。

11 為數不多的一些虛詞,它們的使用率很高,用法很複雜,詞典里應該予以較大的篇幅。但應該注意,一些用法上的細節不應考慮。因為詞典和討論語法的書不同,必須簡練而有典范性。

12 實詞一般以闡明詞本身的詞彙意義為主。為了適應讀者的需要,也可以適當的說明一些用法,也就是說明和其他詞的配合關係。這種關係多半是語義上的關係,說明之後,也能更深切的揭露詞的詞彙意義。例如,動詞“招展”我們可以說明它“不帶賓語”,“希望”可以說明它“不能帶含具體意義的名詞賓語”,“克服”

可以說明它“跟‘困難’、‘落后思想’等含壞意義的賓語”,副詞“一度”可以說明它“前面只能加表示過去時間的副詞或副詞短語”,形容詞“和”在“沒有戰爭或爭執的”的意義上,可以說明它“只用於否定句中”,如此等等。

13 成語從字面上可以看出和現代意義的聯繫的,不必注明來源,如“一箭雙雕”只須注明“一次行動得到兩種收穫”就夠了,不必指出出於北周長孫晟游獵的事;如果指出來源對現代的意義沒有什麼幫助的,也不必指出,如“一成不變”就是指出本於禮記王制“一成而不可變”,對於這個成語的現代意義也沒有什麼幫助;如果成語的來源和成語的現代意義有密切的關係,不注明便很難理解成語的現代意義的,則用最簡明的方式加以注明,如果成語中含有詞典里不收的古字時,也附帶加以解釋。例如:

破釜沉舟 “釜”就是“鍋”。秦朝末年,項羽和秦兵打仗,過河後,把船弄沉,把鍋打破,向士兵表示誓死不退;後來人用這話表示下定決心,直向前不退後的意思。

二 詞的使用範圍

14 語言中有些詞沒有什麼特殊性,可以應用在各種交際形式和交際場合中,如“山”、“水”、“綠”、“睡”等等。這些詞大部分屬於基本詞彙,是詞彙的骨幹部分。但也有不少詞,由於它們本身的某種特殊性,只能應用在一定的交際形式和交際場合中,如“渦輪”只用在工業上,“尖兵”只用在軍事上,“追肥”只用在農業上,“話說”只用在章回小說上,等等。這些詞是詞彙在發展和豐富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它們使語言在不同場合有表達不同內容和情調的充分能力,因此也是詞彙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沒有它們,詞彙的貧乏是不難想像的。既然這些詞的使用範圍有所限制,詞典里就不能只說明它們意義的本身。為了擴大普通話規範的影響,為了使讀者能夠更正確的掌握這些詞的用法,詞典里還必須注明這些詞的使用範圍。

詞的使用範圍總的說來,可分為下列幾個方面

- (1)文章體裁:詩歌、戲曲、小說、公文、法令、外交辭令等等。
- (2)專門術語:天文、地理、物理、化學、政治、經濟等等。
- (3)感情色彩:喜愛、憎惡、諷刺、尊敬、莊重。
- (4)語言類別:方言、古語、外來語、書面語、俗語。

15 詞典里注明詞的使用範圍的辦法,可以根據具體情況或是採用標志,或是在注解里附帶說明。以下各條分別說明詞的各種使用範圍和標注情況。

16 文學語言的不同體裁,擔任不同的表達任務。

任务不同,所用的詞彙有些也往往各有其特殊性。把这些有特殊性的詞彙随便乱用,便会减低表达的作用,至少使人有不协调的感觉。因此词典里应该注明这些詞的特殊性,也就是注明它們所屬的文体。例如:

- 来 (助)[詩歌]表示停顿并补足語句音节。|| 摘了一朵又一朵,你一把~我一把。(課)
之 (代)[公·法令]指称人或事物,只作宾語用。|| 詳細办法在实施細則中規定~。(刊)
敬礼 (名)[書·公]恭敬的礼节。|| 此致革命的敬礼!(刊)

17 沒有进入普通話的專門术语,词典里按照第一章的規定不收。已經十分普遍的專門术语,术语的色彩已經不显明的,也無須注明。如“生产”、“劳动力”、“合作社”、“革命”、“主席”等,不必标注“經济学”、“政治学”等等。词典需要标注的是已經进入共同語,但还不是在任何場合都碰得到的專門术语。例如:

- 主語 (名)[語]句子中被陈述的对象。
国体 (名)[政]按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而确定的国家性質。
飽和 (形)[化]在一定溫度下液体中所能溶解的物質不能再增加了。

18 有些詞在基本意义之外还具有某种感情色彩,这种感情色彩使这些詞只能用于某些特定的場合。词典里应该注明这些詞的感情色彩。例如:

- 闊 (形)[諷]有体面。|| 現在可要~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魯、二,182)
老头子 (名)[憎]年紀大的男人。|| ~越老越糊塗。(老、选,144)
老头兒 (名)[爱]年紀大的男人。|| 卖硬面饅头的~又来了。(曹、北,180)
战士 (名)[敬]士兵。“二十二个英雄~一面扑灭自己身上的火,一面还是冲、冲、冲。(課)

19 有些詞常用于,或只用于庄严郑重的場合,在这些場合如果使用它們的同义詞,便觉得分量不够,不得体。詞的这种特性,词典里应该注明。例如:

- 誕辰 (名)[庄]生日
父亲 (名)[庄]爸爸

20 有些詞口語里根本不用,或很少用,但書面語里却使用或經常使用。詞的这种特性,词典里应该注明。例如:“則(連詞)”、“便(副詞)”、“如何”等等,都应注明为書面語。

21 有些詞表达往往很形象化,且富有感情色彩,但因含有粗野意味,在比較文雅庄重的場合都不用。用在口語里的时候比書面上多。这些詞在词典里应该注明为俗語。例如:

膿包 (名)[俗]無能的人。|| 他好奇的想:——这个~怎么这样胆小,連家也不敢回了。(丁、桑干,186)

王八蛋 (名)[俗]罵人的話。|| 我宰了你这个~!(老、龙,52)

22 方言詞在普通話中流傳得很广泛,像“垃圾”、“搞”、“垮”等等,已經感觉不到方言意味的,应作为普通話詞彙看待,词典里用不着注明出处。对于普通話中虽已使用,但还不够普遍的方言詞,词典里应该注明为方言。例如“尷尬”、“俺”、“幢”、“拆爛污”、“啥”等等。

23 有些詞,大部分是古詞,在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品中,应用得相当普遍,但在目前文学作品中已經不用或很少应用了,这些詞在词典里应该注明为旧詞。例如:

- 懔然 (副)[旧]害怕的样子。|| 使他沒有搬进学校就觉得~。(叶、选,64頁)
依稀 (形)[旧]隱隱約約的。|| 再看旧洞口,却~的还見有許多的爪痕。(魯、呐,176)
伊 (代)[旧]女性的第三人称。|| 桥脚上站着一个人,是我的母亲,双喜便是对~說着話。(魯、呐,197)

表明历史各个时期汉民族生活和文化特征的詞,表明世界历史上重要事物的詞,词典里不加标志,只在詞的注解里,附帶指出这些詞的历史的或地域的特征。例如:

- 木乃伊 (名)古代埃及人以防腐藥品保存下来的尸体。
科举 (名)从唐代到清代封建統治者选拔为自。已服务的人員的考試制度。

24 词典里只注明使用不广泛,一般人还感觉它不是汉語詞的那些借詞,像“模特兒”、“康拜因”、“歇斯底里亞”等等。借詞已經变成汉語的基本詞彙的,像“葡萄”、“石榴”、“玻璃”、“塔”等等,词典里不加标志。从国外借入的詞,标明是借詞,从国内少数民族語言借入的詞标明是那一带的。从日語借入的詞往往是借形、借义、不借音,只注借詞容易誤認爲翻譯,所以也应注明是日語。不論什么借詞都不注明原文。例如:

- 康拜因 (名)[借]联合机。
哈达 (名)[藏]用白色細紗織成的帶,藏族敬神和見面时表示敬意的东西。也有紅、藍等杂色,但以白色的为最尊貴。
不景气 (形)[日][經]資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的無政府状态所造成的金融停滯、市場蕭条的情形。

(本节完,本章未完)

书刊评论

《普通语言学》上册，高名凯著，东方书店，1954年10月

高名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是一本值得欢迎的书。第一，语言学入门书，中国一向是不多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写的，更是缺乏。本书是运用新观点新方法的头一本语言学入门书，尽管还有需要修正补充之处，不能不说是有价值的著作。第二，本书材料丰富，引用了不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读了这书，初学者可以知道语言学者能从哪些经典著作得到指示和启发，这将有利于他们的进一步的研究。

但是我们也要指出，本书材料虽多，在结合中国实际方面是做得不够的。例如上册“地方方言”一章，没有谈到汉语方言区域的划分；“社会方言”一章，没有谈到中国封建贵族阶级的客厅语言；“文学语言”一章，提出了文学语言在翻译工作上的作用，却没有谈到三国至唐代的佛典翻译，明清两代欧洲书籍的翻译对汉语的影响；指出了中国人滥用外国语词的不当，却没有举出具体例子来；“文字的起源及其发展”一章，对于汉字的起源与发展的叙述尚嫌简略，对于中国文字改革的必要性也没有充分发挥。这些地方使我们觉得，本书利用外国材料的成分多，针对中国具体情况与问题立论的成分少，将来应该适当地补充。

关于地方方言与社会方言，本书的说法也有些不全面、不妥当的地方。

地方方言和社会方言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一定的地域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后者则是为社会内一定的集团服务的。换句话说，地方方言是当地一切人公用的，社会方言则不然。这一点，高先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还说过：“社会方言没有语言的基本要素，所以不能发展成为语言。”（上册88页）这是完全对的。但在叙述意大利共同语如何形成的时候，他却说：

“至于意大利共同语的形成则多半是借助于文学的力量。意大利半岛没有政治统一之前，文豪如但丁、柏特拉克（Petrarch）、保卡齐（Boccace）等的文学作品就在十四世纪影响了意大利语的形成。这些文豪所用的语言也就是他们日常所说所听的话，也就是多斯坎省佛罗棱斯城（Florence）的话。因此，意大利共同语又称为多斯坎语言（Lingua Toscana）。意大利文学语言，其实是从一个外省的方言发展出来的。但丁等人把这方言提高到文学语言的地位，使它成为意大利的共同语。不过这种语言也不能笼统地称为佛罗棱斯的方言，而只是佛罗棱斯所谓‘上流社会’所用的方言；现在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多斯坎方言特点，并没有存在于意大利文学语言里的。”（同上，97页）

这里我们不能不发生疑问：佛罗棱斯“上流社会”的方言，到底和佛罗棱斯人民群众的方言在基本词彙和语法构造方面

相同呢，还是不相同呢？如果基本词彙和语法构造都相同，仅仅是有些特殊词彙不同，那就不应该强调说这仅仅是“佛罗棱斯所谓‘上流社会’所用的方言”，“不能笼统地称为佛罗棱斯的方言”。如果基本词彙和语法构造都不相同，怎么又说是“多斯坎省佛罗棱斯的话”呢？照高先生的说法，好像是佛罗棱斯“上流社会”的方言发展成为意大利共同语，而佛罗棱斯人民群众的方言则与意大利共同语没有多大的关系，这是不是符合事实呢？既然说社会方言“不能发展成为语言”，又说佛罗棱斯“上流社会”的方言发展成为意大利共同语，是不是有矛盾呢？

在叙述巴黎方言发展成为法蘭西共同语的时候，高先生的说法也是过分简单的。他说：

“巴黎方言之发展为法蘭西民族共同语是和当时法蘭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生活有关系的。资产阶级在法蘭西得到势力，占据巴黎之后，他们所说的巴黎话先被当时王室所接受（法国王室是佛朗克人，说日耳曼语系的佛朗克语），再行用到各省。后来更因为文学作家使用了，这种以巴黎方言为基础的法蘭西民族语就成为了一个有力的民族共同语。”（同上，94页）

他又说：

“在巴黎方言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法蘭西共同语，因为巴黎是当时政治、经济的中心，又因为巴黎话是后来文学家们所用的语言。”（同上，97页）

王室接受了某种语言，就能把它发展成为民族共同语吗？那么法国王室原先所说的佛朗克语，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法蘭西民族共同语呢？英国诺曼第王室原先所说的法语，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英吉利民族共同语呢？文学家采用了某种语言，就能发展成为民族共同语吗？那么为什么中世纪欧洲各国许多文学家所采用的拉丁语，不能发展成为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各民族的共同语呢？显然地，巴黎方言之所以发展成为法蘭西共同语，并不仅仅是由于这些因素。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在任何现代的发达的语言中，自发产生的口语之所以能上升为民族语言，一部分是由于语言是以现成材料经过历史发展的结果，如在罗马语中与在日耳曼语中；一部分是由于民族融合与混合的结果，如在英语中；一部分是由于经济、政治的集中造成了各种方言的集中，因而成为统一的民族语言的结果。”①

所谓“经济、政治的集中”，在法国应该了解为巴黎与法国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巴黎成为法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而不应了解为仅仅是“资产阶级在法蘭西得到势力，占据巴黎”。所谓“方言的集中”，应该了解为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的需要，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俄文版第414页（本书上册第91页引用）。

最近 Жирмунский 又有專文論述(見《外國語教學》1954年5期)。在《佛蘭克方言》里,恩格斯以他的豐富的語言學知識、深刻的研究和充分的材料證據反駁了當時語言學家對佛蘭克方言的錯誤看法。恩格斯在劃分方言上,不但考慮到語音對應的規律性,而且,不同于當代,他還着重在詞彙和語法的差別的比較。在詞彙方面,他應用了大量的地名作比較材料,說明方言的界限和種族遷徙的歷史,這是應用語言學來研究歷史問題的一個範例。恩格斯不但精通許多種外國語(他的傳記經常提到這件事),而且對於語言學,尤其是歷史比較法很感興趣,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就可以發現許多地方運用了歷史比較法來解決各種歷史問題。《佛蘭克方言》的譯出對於我國語言學家尤其是方言研究者無疑地將是一種莫大的鼓舞。

可惜譯文質量很差,有許多地方把意義譯錯了。比方,“格黎牧”雖認為它已“解消”於法蘭西語與高地德意志語中,“解消”很費解,似應為“消磨”;Heliand只是古代福音詩的一種,而譯文簡單地譯為“古福音詩”;“變格”譯成“品詞變化”,容易使人誤會為詞類(名、動、形等)的轉化;“輔音轉換”在不同的地方譯成不同的名稱:“子音音變”、“子音演變”,而且都是不妥當的;同一專名,前面作“巴伐利亞”,後面又作“巴燕”。umlaut譯成“變母音”,語言學家也很難想像出這三個字所指的是什麼。希望這樣重要的譯文能夠得到改正。(力山)

《文史哲》(山東大學學報之一),1956年第7期(總第47期)

這期載有蔣維崧、殷煥先兩位先生合寫的《漢字改革和漢語規範化》一文,從“老漢字和字形規範化”、“拼音文字和漢語規範化”兩方面,分別論證漢字所以必須改革的道理和拼音文字的根本優點。作者着重在以拼音文字和字形、語音、詞彙規範化的關係的說明來反駁一些對漢語拼音化的不同看法,特別是對唐蘭先生的文字改革理論及其“綜合文字”,提出了尖銳的批判。

本文能從文字改革理論的各個方面加以全面的論證,特別是徹底揭露了漢字的缺點,這對於由《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公布所引起的文字改革工作的新高潮是有相當作用的。作者在第一部分論漢字方面缺點里,先是舉“尸”“广”幾個簡體字陪襯說也需要“死記硬記”,後面並說明並非簡字破壞漢字結構體系,這就使人更清楚地知道簡字也可以有正字法“規範”。不過,第二部分說“拼音文字使正字法規範成為簡易可行的”,以及說“將來做到正式文字的時候,其中有些同音詞也必須用定型法來區分詞形”,同本文所論證的前後不大照應。總的說來,本文在理論上對持不同見解的人的說服力,似乎覺得有些不夠。

本文把現在試行的“拼音字母”叫做“拼音文字”,這個提法也容易起誤會。此外,把“民主”拼成“mig:u”(見41頁),是作者方音關係,還是排字錯誤,這倒是小節。(勞寧)

《廈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1956年6月出版

這一期發表了洪篤仁先生寫的《漢字的造字原則與改革方向》。作者的意圖是從漢字的傳統造字原則分析入手,論證方塊漢字改革的道路及其必要性。作者說明這篇文章是“為

迎接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發表而作”的。我們覺得在上述方案發表後的今天,去讀這篇文章,對方案的認識是有益的。

作者首先肯定,漢字對漢民族文化的發展,對人民的知識經驗的積累和傳播是有過偉大的功績的。然而,漢字也有著很大的缺陷。首先,漢字是屬於形義的體系。文字是用來記錄語音的符號,表意的漢字卻不便于用來紀錄語音。漢語發展到今天不斷豐富起來,而漢字卻與漢語日漸脫離。古、今漢語不是一個體系,日本、朝鮮、越南諸語言是不同的語族;然而却都用過漢字作書寫符號。這正因為漢字是表意文字。語言與文字的聯繫主要表現在要求文字正確地地音。這使得漢字為了適應發展著的漢語,就慢慢走向拋開字義,單純作記音符號。但用表意文字去表音卻並不理想。表意的漢字字數繁多,掌握不容易。結構複雜,並無規律可循;加上一字多音,同字異體等情形的存在使得漢字既不容易學也不容易寫。漢字有這些缺點,使普及文化,掃除文盲、編纂詞典,打字,印刷,電報以至於中外文化交流,都發生很大的困難。

文章中指出,漢字這些缺點與“六書”的造字原則有關係。作者認為,一般的造字原則不外乎兩類:表形表意的和拼音的。“六書”的造字原則屬於前者。作者詳細地從文字的一般發展規律論到“六書”的問題。從漢字本身說明它只是一種使用表形表意的文字作漢語的書寫工具。雖然這種文字不是沒有採用表音的原則。(9353個字中有7700個是諧聲字)。“六書”本身也表明了漢字的造字原則由表形表意向表音發展的趨勢——這是世界文字造字原則演變的通例。然而漢字本身仍然是表意文字,仍然停滯在方塊的表意文字的階段上,它並沒有擺脫形意的束縛而實行拼音化。為了適應漢語的發展,這古老的造字原則就必須改變。

然而在歷史上,漢字曾有過演變和改革沒有呢?這裡,作者用社會發展史的观点說明最原始的文字到部落公社所公認的文字。從殷周到春秋戰國以至於秦統一全國,文字是有所改變的。不過這種改革從“篆書”到“隸書”到“楷書”、“草書”、“行書”。由圓筆到方筆,由繁而趨簡,漢字是有著變化的。然而所有這一切都只在形意造字的原則內部作改革。這種改革的結果正如作者所說:“只是減輕而沒有根本解決漢字難學”。形義造字法則與語言要求完全表音的原則之間的矛盾完全沒有解決。所以,發展到今天,正像作者所有力的證明的那樣:改革漢字,已經不是在形義的柵欄中作爬行的事,而是根本否定這種根據形義來造字的原則而躍向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的方向。

洪篤仁先生的文章闡說了許多文字發展一般規律的知識。並較細地說明漢字的特征以及漢字發展規律與一般規律之間的關係,作者又從社會發展對漢字演化上的影響,來論證漢字在歷史上存在的變化以及所以停滯的原因。從文字本身和漢族所處的歷史條件說明漢字今天仍屬於表意文字的类型。正確地提出漢字改革走拼音化道路的必然性。洪先生的文章使我們對漢字的歷史面貌以及變化能夠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觀念,對關心漢字改革的同志來說,是值得讀的。(東海)

更正 本刊7月號42頁右23行“暴雨謂之慘”的“慘”為“凍”之誤。

语文短评

编者按：汉语规范化是当前语文工作中一个重要问题。本刊虽然发表过好些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可是在词彙或语法规范方面提出具体问题来讨论的还不多。从本期起特辟《语文短评》一栏，着重讨论这方面的問題，欢迎讀者投稿。語言规范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对于同一现象尽可以有很不相同的意见。本欄发表的不見得就是定論，凡是我們認為“言之成理”的，我們都將在这里發表，借以引起討論。

1 对老老实实做工作的科学家如果在学术問題上發生錯誤，仍然應該受到尊重，“不以言廢人”，“不以人廢言”。（《人民日报》1956年7月2日1版）

头上的“对”字完全是多余的。沒有它，这个句子的骨幹很清楚——“科学家應該受到尊重”。有了它，誰“應該受到尊重”就有点不明不白了。当然也可以采取另一种說法，用不說出来的“我們”做主語。这样，“对”字可以保留，但是“受到”又非去掉不可了。（叔湘）

2 兴趣主义固然是要不得的，但，不要兴趣的主义对于一个人的学习，就会把学习变成一件苦差事。（《新观察》1956年14期13頁）

“对于一个人的学习”这八个字，从意义上看是多余的，在句子結構上也是个累贅。“对于……”和“把……”在一定限度內作用相同，因此一句之內二者連用的情形是少見的。

这一句里有一个值得語法学家注意的結構是“不要兴趣的主义”。这个“主义”能不能还叫做詞尾呢？（叔湘）

3 虽然，倫勃朗由于《夜巡》事件的打击，和前妻莎斯卡的逝世，隔断了他和上層社会的关系。以致造成他晚年的貧困、孤独、乃至赤貧而死。然而資產階級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却愈加引起倫勃朗的深惡痛絕。相反地，因为艺术家愈益接近劳动人民，就愈發对于受难的劳苦人民表示深厚的同情。而他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就愈加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峰。（同上，1956年14期19頁）

这一段文字可以商榷之处很多，且不去細說。特別引人注意的是里边的标点。这里有五个句号，其实只需要兩個。“虽然”和“然而”互相呼应，当中是不能断句的。現在不但在“然而”之前断句，还在“以致”之前断句，真是难于理解。同样，“因为”也是一个所謂提挈連詞，“而”字之前也断不得句。至于这里是否有“愈益……愈發……愈加”还需要用“因为”（究竟是比例关系还是因果关系），那是另一問題。現在写文章的一般情况是逗号太多，句号太少，許多可以断句、應該断句的地方不断，这一段倒是正相反。不过逗号太多的毛病也还是有，第一行的两个逗号都是多余的。联結前后两个詞語，有时候用“和”，有时候用逗号，照例不同时并用。“虽然”之后用逗号，現在相当常見了，大概是受了“但是”之后的逗号的影响。严格說，“但是”之后也不必用逗号。不过“但是”、“所以”、“因此”等連詞的作用是承上，在它們后面用个逗号表示停頓还情有可原，“虽然”、“因为”、“如果”等連詞的作用是啓下，后面是不該有停頓的，为什么要用逗号隔斷呢。（叔湘）

4 北方能大量种水稻嗎（《人民日报》1956年7月10日社論題）

这篇社論的主题是北方能大量种水稻，延边地区水稻丰产是其明証。要按这个意思，标题最好改为“北方也能大量种水稻”或者“北方不能大量种水稻嗎？”用“嗎”字的問句有时候是詢問，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反問。沒有上下文的“北方能大量种水稻嗎？”是很容易使人誤解的。加一个“不”字，讀者一念就知道这个标题是反問，“等于說北方也能大量种水稻”。又，原文未加問号。按标点通例，标题不加句号，但如果是問句，还是應該加問号。（迂公）

5 水順着她的兩條小辮往下流着，水順着她的鼻尖、下巴往下流。(《北京文艺》1956年5月2頁)
什么地方該用“着”，什么地方不該用，现在的确有点模糊起来了，不过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句子之中总是應該一致的。如果上半句的“流着”对，下半句的“流”就錯了；如果下半句的“流”对，上半句的“流着”就錯了。二者必居其一。筆者的意見，这里是沒有用“着”的必要的。(迂公)

6 北京有不少的讀者是从邵力子代表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會議上关于节育問題的發言中熟悉这位江南名医的。(《北京日报》1956年7月2日1版)

仅仅知道了一个人的姓名，就可以說是“熟悉”了嗎？很可能連他的姓名都沒記住，只記得邵力子代表介紹了一位医生用蝌蚪避孕的方子，那就更說不上“熟悉”了。(亦鳴)

7 大風大雨时注意門窗的关闭，以免門窗玻璃的损坏。(某机关宿舍《注意事項》)

为什么不說“注意关闭門窗，以免损坏門窗玻璃”呢？我們有些同志仿佛有这样的信念：文章越不像說話越好。这种信念非破除不可。(亦鳴)

8 在农村工作的同志都知道，除了五一节、国庆日，平常是沒有禮拜天的，难得一整天休息的机会。(《人民文学》1954年4月，《年假》)

五一节和国庆日不包括在禮拜天里面，因此不可能从这里面“除”出去。这里的錯誤是把“禮拜天”看成了“放假日”的同义詞。改法：(1)“禮拜天”换成“放假日”；(2)說成“……禮拜天是不放假的，除了五一节、国庆日，平常难得一整天休息的机会。”(徐采芹)

9 炊事員为了接待祖国来的亲人，也煞費苦心。今天給我們吃大米飯，明天吃面餅。我們住的地方剛好与伙房鄰近，炊事員在半夜下兩点就起来烙餅。(《赴朝慰問記·第一个目的地》)

有兩個地方可以斟酌：一、从修辞上看，“明天吃面餅”跟上文“今天給我們吃大米飯”不匀称；从語法上看，“吃面餅”前面缺少个名詞做“兼格”。改法：(1)补上“給我們”；(2)說成“給我們今天吃大米飯，明天吃面餅”。(1)的說法順适一些。二、最后兩個分句之間意义上的联系不明显，應該在“炊事員”之前补上“常常听到”。(徐采芹)

10 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正在風景幽美的風景区度假日。(《人民日报》1955年5月9日画頁)

修飾語“風景幽美”和中心語“風景区”重复了。改法：(1)刪去“風景幽美”；(2)刪去前一个“風景”；(3)說成“風景幽美的地区(或地方)”。(徐采芹)

11. 王二老伯抱着一只还在痉挛的牛腿上嚎淘大哭起来。(新文艺出版社：《鋪草》，97頁)

“抱着……牛腿上”不成話。改法：1)去掉“上”；2)“抱着”改“伏在”。(茜莠)

12. 春天我在大地上种滿美丽的果园。(《电影故事》，总第34期，28頁)

果园不能种。改法：“种滿……果树”，(茜莠)

13. 宋江这支农民武装被統治階級作为工具，征服了辽国的侵略，就去剿灭田虎、王庆、方臘等农民革命武装。(《文艺学习》，第2期，17頁)

“征服”和“侵略”搭配不攏。改法：“打(击)退……侵略”。(茜莠)

14. 或者請求族長給我們禱告百兽之王讓我們帶了捕机去打一次順利的狩獵吧！(潮鋒出版社：《朱拉》，164頁)

“打”和“狩獵”搭配不攏。改法：“順利地打一次獵”。(茜莠)

15. 這兩座酒楼，一在潯陽府，一在大名府，都是当时的大城市，所以修建得十分宏偉。(《光明日报》，1954年8月8日，3版)

酒楼不是大城市，邏輯关系不对头。改法：“都是”后加“在”字。(茜莠)

信箱

“以上”和“以下”的用法

陳壽頤

鄒定中先生在《“以上”和“以下”的含義問題》一文(《中國語文》1955年9月號)中指出,由於運用它的人們有的採用包括式,有的採用排除式,往往使人猜測難定。他說“以上”和“以下”的含義,如果沒有統一的标准,在說明問題時就難免要多加解說或注釋,以致文字累贅,因此主張統一採用包含本數的含義。

鄒先生的主張是有其積極意義的。但是要使“以上”和“以下”的含義明確,僅僅規定一個包含本數的含義是不夠的,還必須結合劃分界限的标准作進一步的探討。因為“以上”和“以下”的含義所以含糊不清,其主要原因還不在於沒有統一的含義,而在於不善於正確選擇劃分界限的标准和不善於靈活掌握“以上”和“以下”的用法。如标准選擇適當,並且也運用得當,無論它包含本數或排除本數,含義都很明白。否則,像“50元以下,51元以上”的例子,無論“以上”和“以下”包含本數或排除本數,仍舊都難於了解。

劃分界限的标准有兩種:一、是採取一點(即一個數字、一個時間、一個地點)作為劃分界限的标准;二、是採取兩點(即兩個數字、兩個時間、兩個地點)作為劃分界限的标准。無論採取哪一種标准,界限的兩端必須密切相接,既不能有絲毫的重疊,也不能有絲毫的空隙。

劃分的對象,如果是只能用整數表示的(如人數、筆劃數和序數),則宜採取兩點作為劃分界限的标准。在這兩點之間,雖然不可能有中間數,但如果“以上”和“以下”採取了排除本數的含義,卻會使界限的兩邊發生空隙,因此應該採取包含本數的含義。在這點上,我同意鄒先生的主張。例如鄒先生改寫過的例子,“錯字中11畫以上的和10畫以下的,大約是56與44之比”,就應該採取包含本數的含義,而且形式上也自然形成了包含本數的含義。

劃分的對象,如果是不僅能用整數而且也能用小數表示的(如丈、尺、斗、升、斤、兩、年、月、日、元、角、分等)和屬於地域的,若仍採取兩點作為标准,那末在這兩點之間就有中間數。“以上”和“以下”等排除本數時,界限的兩邊固然會發生空隙,包含本數時,也仍會發生空隙。例如“50元以下,51元以上”,其間有50元1角等很多中間數,它們不屬於任何一邊。要消除這個缺點,就不是規定一個包含本數的含義所能解決的。

“以上”和“以下”等可以同時并用,也可以只用一

個,另外用含義較明確的字來代替另一個。例如“不足”“不夠”“不滿”“不到”“不過”“小於”“少於”等,可與“以上”并用;“足”“夠”“滿”“到”“超過”“大於”“多於”等,可與“以下”并用。鄒先生認為簡明的6個例子,全部都是屬於這一用法,我也認為這6個例子的確具有簡明的優點。不過它之所以能夠如此,主要並不是由於“以上”或“以下”採取了包含本數的含義,而是由於採取了這種混合用法,使界限的兩端既不重疊,亦無空隙。如果并用的字配合得適當,“以上”或“以下”包含本數時固甚簡明,即使排除本數時也很簡明。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年滿13歲者即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13歲以下者無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這里我並不反對採取包含式,但是我認為更重要的卻要能根據劃分界限的原則,靈活掌握“以上”和“以下”的用法。

有時還可以完全不用“以上”和“以下”,而以含義比較明確的字全部代替它。例如鄒先生所舉的第二個例子:“即尾數不滿50元者不計,滿50元者按100元計貼印花”。“不滿”代替了“以下”,“滿”代替了“以上”,含義也很明確。可是鄒先生卻認為它“雖明確肯定了問題,但多花了一些字句來說明”。這就使我很難理解,它究竟多花了那些字句來說明呢?如果說它本身的字句全部都是注解,那就錯了。因為它主要並不是注解“100元以下”的,而是注解“4舍5入”的。在這一點上,我不同意鄒先生的看法。

當然也有時是很難以適當的含義明確的字來代替的,例如關於地域的劃分就是如此。在這樣的情況下,可以不必另用其他的字來代替,以免含義不明,文字累贅。但須採用適當的表現方法,就是單獨說明劃分點,使字句本身形成都排除的形式。例如:“津浦鐵路在長淮衛及其以南的路段,屬上海鐵路管理局管轄,長淮衛以北的路段,屬濟南鐵路管理局管轄”。在這個例子中,既不能採取兩點作為劃分界限的标准,又很難以適當的含義明確的字來代替“以南”或“以北”,只好仍舊使用它。如果不單獨說明劃分點長淮衛,而都採取包含式,勢必發生重疊;否則,卻又會發生空隙。因此必須單獨說明劃分點長淮衛,使“以南”和“以北”都形成排除長淮衛的形式。這種方法雖須加說明或注解,但是在難以適當的含義明確的字來代替的情況下還是必要的。

《拼音》月刊創刊啟事

《拼音》月刊是一个普及汉语拼音知識，討論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和实验汉语拼音文字的刊物。这个刊物的主要内容有：拼音基本知識的介紹，汉语拼音方案的討論，有关汉语拼音文字的各项問題的研究，中国文字改革历史和外国文字改革經驗的介紹，还有各种内容和各种体裁的汉语拼音文字实验讀物，以及有关汉语拼音文字的各种研究参考資料等等。拼音文字实验讀物，大約占每期篇幅的一半。

这个刊物的对象是語文工作者、各級学校語文教师和一般关心文字改革的人士。

《拼音》月刊决定在1956年8月15日創刊，每月出版一期，由拼音月刊社編輯，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定价每期二角四分。讀者請向当地邮局訂閱。

文字改革出版社 北京邮局發行

新 書 介 紹

苏联俄語教学論文选 苏联 巴里諾娃等著 0.12 元

这里选譯了兩篇有关發展学生語言的文章。第一篇是就培养語言技能問題作概括的說明，指出它的重要性，說明有哪些教学方式；第二篇是系統地闡述俄語教师在發展語言的工作中應該达到哪些基本要求。这两篇都是苏联先进教师的总结性的經驗，可供我国語文教师参考。

苏联文学教学論文选 苏联 阿别克西赤等著 0.85 元

本書的文章是根据苏联最近几年出版的“文学教学”双月刊和文学教学法方面的書籍选譯出来的。書中的内容包括下面几項：（一）五年級文学閱讀課的教学方法，五年級文学閱讀課的書面作業、詞彙教学和个别短篇小說的分析；（二）七年級怎样研究高尔基，七年級个别作品的課堂教学系統；（三）五至七年級怎样进行課外閱讀課；（四）八年級怎样研究萊蒙托夫，八至十年級怎样研究文学作品里的語言。本書介紹了苏联文学教学中的一些先进經驗，可供我国中学文学教师参考。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市期刊登記証出期字第022号
經中国人民邮政登記認為定期出版物

每册定价人民幣0.24元
(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中國語文

月刊

1956年8月号

总第50期

1956年8月22日出版

編輯者 中国語文編輯委员会
北京海甸中关村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桥

总發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代訂 全国各地新華書店
代銷处

預定：三个月0.72元，半年1.44元，全年2.88元；寄費：1.平郵寄費不計，2.挂號郵費由訂戶負擔。

1-34,655